

第三章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之考察

汪宏倫

一、導言：東亞的國族問題與戰爭遺緒

回顧 2012 年的東亞，可說是國族主義烏雲罩頂的一年。首先，韓國總統李明博在 8 月間登上日本也同樣宣稱擁有主權的獨島（日方稱竹島），引發日方不滿而召回大使，雙方外交關係緊張。韓國足球選手在倫敦奧運期間，也因為在場內高舉「獨島是我們的」的標語，失去獎牌資格，引發爭議。9 月間，日本政府為了因應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購買尖閣諸島（中國稱之釣魚島，台灣稱之為釣魚台）的計畫，收購釣魚台將之「國有化」，引發中、港、台等地新一波的保釣風潮，中國各地爆發規模前所未見的反日示威抗議，釀成外交危機。台灣與中國分別派遣海巡船艦與飛機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與日方對峙，儼然有劍拔弩張、兵戎相見之勢。此外，中國政府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屢屢與菲律賓、越南等國齟齬摩擦，更在新版護照上將「九段線」畫入，將南海諸島畫入中國版圖以宣示主權，引發鄰近諸國的不滿與抗議。同樣地，中國的新版護照中將台灣的日月潭等景點納入，也被認為是侵犯台灣（中華民國）主權，引發綠營與獨派人士的強烈不滿與抗議。在台灣，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兩岸問題上採取較為溫和的政策與立場，卻不斷激起反對陣營「傾中賣台」的批評聲浪，而 2008 年的總統大選，敏感的統獨議題或族群因素並未像過去選戰成為爭辯議題，然而更為隱而未顯的「中國因素」，以「九二共識」的議題為中介，巧妙地影響著選舉的結果，同時也在選後引發了更多的疑慮與批評。

很顯然地，東亞的民族主義風潮，在近年有逐漸上升的趨勢，表現在中、日、韓、台之間的歷史認識、領土問題、主權爭議等議題上，甚至有引爆戰火的隱憂。這股民族主義風潮，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具有深遠的歷史背景與結構因素；尤有甚者，這些民族主義之間彼此交織牽連，構成了交錯的民族主義圖像（石坂浩一等 2005）。筆者過去對台灣、中國、日本的研究也發現，在交錯的民族主義之下，其實存在著「重層的怨恨結構」。換言之，東亞的幾個社會，都曾經因為歷史上的屈辱、挫敗、苦難與悲情而存在著明顯的怨恨心態（*ressentiment*），甚而進一步形成了「怨恨的共同體」。這些怨恨的共同體之間並沒有因為彼此曾經共有的被壓迫與受害經驗而更加了解彼此或形成共同連帶，反而彼此怨懟嫌惡，形成了東亞重層的怨恨結構（汪宏倫 2006, 2010, Wang forthcoming）。無論是交錯的民族主義或是重層的怨恨心態，在東亞出現的這些現象，都和近代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與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同本書導論所指出的，追本溯源來說，當前東亞的國族問題，乃至現代政治的許多癥結，其實都與近代史上一連串的戰爭及其遺緒有關。如何把戰爭帶入分析，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上同樣重要的問題。如果不對戰爭與戰爭遺緒加以問題化，那麼我們便難以捕捉到這些問題的原來面貌，而這些爭議或問題將很難有（和平）解決的一天¹。進一步說，現代性在東亞的開展推進與戰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要理解東亞現代性的特質並對現代性有所批判，戰爭與集體暴力將是核

1 對於某一部分的人來說，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和平，和平也不見得可欲。關於這種觀點與思維方式，將在第四節討論。

心的關鍵。

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繼續追問幾個值得釐清與深究的問題：為什麼東亞諸國重要的內部分歧與外部爭議，都與戰爭及其遺緒有關？戰爭在形塑這個區域的現代歷史過程，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如何理解戰爭及戰爭遺緒的作用？我們又該如何將戰爭問題化，從根本處來反省戰爭？戰爭所導致的最壞結果是大量個體的死亡，發動戰爭、參與戰爭，意味著有可能犧牲生命。這幾乎是個人所能付出的最高代價。在什麼狀況下，人們會願意以高昂的生命代價為賭注而訴諸戰爭？人們又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為？

作為一種人類集體暴力的極端形式，戰爭深刻地形塑著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反過頭來說，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與價值觀，也決定了戰爭的發生與否，以及戰爭的型態與進行方式。本文將以「戰爭之框」來指稱這種認知方式。在下兩節中，筆者將闡釋「戰爭之框」的分析概念，並探討戰爭之框如何形塑著日本與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同時也將分析這些戰爭之框如何影響台灣的國族政治。最後一節，則嘗試針對現代性與集體暴力提出理論反省。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有必要不厭其煩地對「東亞」此一概念稍作說明。自從薩伊德的《東方主義》（Said 1979）問世之後，人們對於指涉文明、文化與地域的統稱詞彙總是格外小心謹慎，生怕落入語意的陷阱而遭受「東方主義」或「自我東方化」的指責。「亞洲」是西方殖民者與帝國主義來到此地之後才創造出來的概念，「東亞」也不例外。本文所稱「東亞現代性」中的「東亞」，自然也不是個本質主義的實體指涉，一方面指的是地域，一方面則指這個地域在歷史文化的建構性與共通性，包

括相同或類似的歷史命運與社會形構（參見 Duara 2003, 白永瑞 2009）。就地理範圍來說，本文所稱的東亞包括當前的中國、日本、台灣與韓國、朝鮮（北韓）等地。不過，因筆者學力有限，無法直接掌握韓文的一手資料，對韓國與朝鮮的情形大多只能依靠譯著與二手資料，不敢擅發議論，因此本文的主要分析對象將僅限於中國、日本與台灣；然而，本文對戰爭與戰爭遺緒的分析，基本上也適用於迄今仍被冷戰體制割裂的韓半島²。

本文的主要論證可簡述如下。戰爭是一種集體行使組織化暴力的極端形式；由於其極端暴力的性質，戰爭經常成為轉化既有社會結構的歷史事件。透過這樣的歷史事件，舊有的社會結構被摧毀或改變、新的社會結構則透過戰爭過程與戰後重建而逐漸形成。本文用「戰爭之框」來指涉這種框構（framing）的過程。戰爭之框有兩層意涵。第一個意涵，是由戰爭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框架；第二個意涵，則是關於戰爭的認知框架，透過這個框架，戰爭被賦予意義、並根據此框架被加以詮釋與記憶。由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或多或少都經歷了戰爭或武裝衝突的過程，因此幾乎每個民族國家背後，都存在著戰爭之框，而這些戰爭之框並不隨著戰爭結束而消失，反而因為民族國家的建立而被制度化，成為「國族之框」。這些從戰爭之框演變而來的國族之框，在現代政治運作中，對於區辨敵我、鞏固認同，具有基本而重要的功能與作用。戰爭之框能被「定調」與「再定調」；近代以來，戰爭之框多半以國族主義為其基調，尤其在一次大戰前後的歐洲達於頂峰。二戰之後，西歐的

2 白永瑞認為這僅是狹義的東亞，而廣義的東亞應該包括東南亞。本文所界定的範圍與討論脈絡僅限於狹義的東亞。

戰爭之框多半不再以國族主義為基調，強調的是跨越國族的普世人道主義精神；然而，在當前的東亞，國族主義仍是戰爭之框的基調，而這些存在於不同國家與地域的戰爭之框往往彼此扞格不入，這些戰爭之框不但形塑著國內的政治分歧，更成為今日東亞潛在衝突不斷且難以達成和解的原因。本文嘗試指出，在東亞目前各國之間與之內的國族主義紛爭，其實背後隱含了不同的戰爭之框，這些戰爭之框一方面為過去的戰爭所創造出來，但並不隨著戰爭結束而消失，反而成為重要的認識框架，形塑著人們對於過去歷史、現實情勢與未來走向的判斷與認識。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於提出戰爭之框作為分析概念，並簡要地勾勒當前存在中、日、台各地幾種不同的戰爭之框，梳理這些戰爭之框與國族主義的關聯。換句話說，本文的首要目的在於理論概念的建構，而不是關於歷史個案的經驗分析。關於日本、中國、台灣三個個案的討論，在本文僅是作為闡釋理論概念與分析架構之用。限於篇幅，本文僅能提出初步的綱要，至於進一步的細緻分析，還需要來日的研究³。至於本文必須同時討論三者、而非集中在單一個案深入處理，主要原因在於本文的目的是要闡釋，這些不同的戰爭之框如何相互排斥、交織牽連，把彼此當作框外的「不可悲傷的敵人／他者」，如此才能凸顯出戰爭之框背後所隱含的問題。如果僅僅集中在其中之一，我們便失去了一個完整分析的視野，

3 事實上，本書中的部分篇章（例如第七章與第十章），已經反映出了不同的戰爭之框在台灣的存在與運作。至於有關中國的戰爭之框的進一步分析討論，可參見汪宏倫（2013）。

也難以看出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關聯。正如 Joas (2003: 53) 所說，此時迫切需要的，不是蒐集更多的細節材料，而是指出並分析這些現象、議題之間的彼此關聯，方能有助我們獲得全景思考、理解整體圖像⁴。

二、理論與概念：戰爭、「戰爭之框」與國族建構

對於戰爭與戰爭遺緒，本文採取較為寬鬆的界定方式。所謂戰爭，主要指兩個有組織的武裝政治團體（其中通常至少一方為國家）之間進行的暴力抗爭。在國際法上，主權國家之間的戰鬥行為被視為戰爭，但不是主權國家的交戰團體，通常不被視為戰爭，而被視為叛亂、暴動或內戰⁵。本文對戰爭的界定並不循此。只要兩個武裝團體的暴力抗爭是以政治權力的分配、遂行或爭奪為目的，就可以視為戰爭。因此，台灣早期漳泉、閩客之間的械鬥不太能算是戰爭，但「霧社事件」可說是個戰爭，1927年8月1日發生於南昌的武裝鬥爭（國民黨稱之為「南昌暴動」，共產黨稱之為「南昌起義」）也是戰爭。至於稱

- 4 當然，這裡的意思並不是說，細節與資料不重要。細節與資料，往往能幫助我們釐清過去許多誤解與偏見，甚至藉由新事證的提出來反駁既有的看法。不過，當前有關戰爭與戰爭遺緒的研究，所欠缺的正是——一個整體互動的圖像。許多過分執著於細節的考證，或是僅針對單一個案經驗（例如日本）的考察，反而容易衍生「見樹未見林」的疑慮。
- 5 這種看法的典型，可參見 Bull (1977: 184-186)。事實上，這種把戰爭與主權國家相連結的界定方式，正是現代性問題的一環，本身值得深入反省批判。關於西方主流「戰爭」概念的反省批判，另可參見朱元鴻（本書第二章）。

之為「事件」、「暴動」還是「起義」，端視詮釋者所仰賴的框架而定，也就是下文將要討論的「戰爭之框」。以武力為手段進行的革命，也是一種戰爭，因此鄂蘭在《論革命》一書中引用列寧的說法，將革命與戰爭關聯起來（Arendt 1963），而朱元鴻（本書第二章）則是將俄國與中國的共產革命稱之為「戰爭共產主義」。至於「戰爭遺緒」，則是泛指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以及（戰爭之後）環繞戰爭而衍生的種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活動，例如領土疆界、主權歸屬、賠償、審判、戰爭責任的追究、歷史書寫、戰爭記憶等問題。

有關戰爭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過去已有不少學者討論。有些學者強調強制手段的集中與資源榨取（Tilly 1992），有些強調徵兵動員、公民養成與內部綏靖的過程（Giddens 1985），有些從生命政治（bio-politics）與治理性的角度來理解戰爭（Foucault 2003, Rose 1999），有些則強調集體記憶與紀念儀式對形塑國族認同的影響（Mosse 1990, Winter 1995）。這些面向與切入角度固然重要，也提供了豐富的洞見，但為了探討人們如何理解戰爭、而戰爭又如何形塑人們的世界觀，本文將嘗試提出「戰爭之框」作為主要分析概念。

所謂「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主要有兩個概念來源，首先當然是來自 Judith Butler (2009) 同名之作的啟發。在 *Frames of War* 一書中，Butler 利用英語 frame 一字兼具「框架」、「構陷」等多重意涵，界定「戰爭之框」為「選擇性地刻畫作為戰爭行為本質之經驗」的方式，從而構成了一種感知生命的認識論架構。她以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虐囚照片為例，探討「戰爭之框」如何讓人們區分「可悲傷的」（grievable）與「不可悲傷」（non-grievable）的生命。Butler 進一步借用此一比喻，

探討包括性別政治在內的主體形成，哪些生命是被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生命是被刻意忽略，甚至不被認為有資格形成主體的。

和 Butler 的文學比喻手法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對「戰爭之框」的界定與分析方式，主要還是承襲第二個來源，即社會學中「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的傳統。社會學的框架分析主要可追溯自 Goffman 的同名之作。在《框架分析》這本被廣為引用的著作中，Goffman 將框架界定為「管理社會事件以及我們對其主觀涉入的組織原則」(Goffman 1974: 10-11)。根據 Goffman，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一些基本框架(primary frameworks)，人們必須透過這些基本框架來認識世界、理解當下；缺乏這些基本框架，世界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言。

Goffman 承襲 Schutz 的現象學傳統，關心的是人們如何感知外在、界定現實的問題。個人面對這個世界紛然雜陳的刺激、現象與事件，必須仰賴一些基本的原則來選取與組織她的經驗，才能產生意義，而這些基本原則就是 Goffman 所稱的框架，或可稱為識框(cognitive frame)。我們可以說，框架或識框指的是建構意義時所依據的要素選取原則，行動者藉此選取原則來界定其所面對的現實。這個理論觀點後來被大量應用在社會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包括媒體研究與心理學等其他學科也都有「框架分析」的傳統。在社會學領域，框架分析被廣泛用在社會運動的研究，研究者以此概念來連結微觀層次的個人心理動力與宏觀層次的政治機會結構，指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投入社會運動時，必須透過框構(framing)的過程，賦予行動以意義(Snow et al. 1986, Benford and Snow 2000)。

框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被「定調」與「再定調」

(keying and rekeying)的。Goffman 借用了音樂的類比來使用「調性」(key)這個概念，將之界定為「一組慣習，這種慣習將原本根據基本框架已經有意義的活動，轉化為另一種同樣模式的活動，但對其參加者來說其意義已經有所不同」。Goffman 舉的例子是一群看似在打架的孩童(或動物)，他們從事的活動從外表來看與爭鬥無異，但其實他們僅僅是在玩耍，而不是真的在爭鬥⁶。框架的定調／再定調可視為是一種框架的轉化(transformation of frames)，而這又牽涉到再一次的框構過程(Snow et al. 1986)。

根據這個「框架分析」的傳統，本文所稱的「戰爭之框」包含兩種意涵，第一種意涵指的是戰爭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框架，第二種意涵則是指人們藉以界定、理解、詮釋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框架。這兩種意涵是相關的，但內容不完全相同。戰爭作為一種有能力改變社會結構的歷史事件⁷，本身即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認知框架，這種認知框架會影響到人們看待自我與世界的方式，當然也包括對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方式。和社會運動類似的是，戰爭需要集體動員，戰爭之框便是動員與被動員者建構戰爭意義的主要框架。然而，戰爭動員的層面比起社會運動來得廣泛全面得多，尤其在現代，戰爭之框經常涉及國族建構，並非所有的國族成員都被動員直接參與戰爭，但戰爭之框卻提供了國民全體理解與詮釋戰爭的框架。現代戰爭與前現代

6 Goffman 另外舉的例子還有：假裝(make-believe)，競賽(contests)，儀式(ceremonies)，以及技術重複(technical redoing，如練習等)(Goffman 1974: 48-60)。

7 關於歷史事件如何改變結構，參見 Sewell (2005)。

的戰爭相較，除了武器因科技與工業化的發展而導致戰爭型態與戰略思維的改變外，另外一個關鍵的不同，在於平民百姓被廣泛地動員涉入戰爭之中 (Kestnbaum 2005)，而這個動員過程，其實也就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基礎之一。和國族的建構一樣，戰爭之框也有「從上而下」與「從下而上」的雙向框構過程。在一開始的時候，戰爭之框比較有可能是國家由上而下的建構過程，用意在於區辨敵我，動員人力與物力參戰。但隨著戰事的進展與時間的推移，戰爭之框也會不斷被知識分子、文化菁英與一般民眾加強、放大乃至重塑。因此戰爭之框不僅可見於國家的動員文宣與行動，更可見於諸多描述、討論與詮釋戰爭的相關論述與實作裡，諸如文學、戲劇、電影、藝術作品等。

作為一種提供意義與價值的框架，戰爭之框首先要劃定界線，區辨敵我。Butler 的戰爭之框指的是框架／構陷那些戰地攝影作品的有形／無形的框，而本文的戰爭之框指的則是框構戰爭群體內外之別的無形的框。和 Butler 的戰爭之框類似的是，本文的戰爭之框也同樣區分了「可悲傷 vs. 不可悲傷／不值得悲傷」，甚至是「值得活 vs. 不值得活」的生命。框外的敵人不是野蠻的匪徒、邪孽的妖魔就是萬惡不赦的反動派，他們不僅是「非我族類」，而且不是「人」，不值得同情憐憫，非僅可殺，而且該殺。消滅這樣的生命不僅不值得惋惜，還該慶幸，甚至要積極參與。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國共內戰時國民黨與共產黨互稱「共匪」、「蔣逆」，二戰時日本把盟國稱為「鬼畜米(美)英」、盟軍的宣傳也是竭盡醜化日本之能事，把日本人說成是猴子，這些都是著名的「戰爭之框」把對手「非人化」的例子。

在戰爭之框的內部，則是可悲傷的生命。共同的受苦經驗

是激發團體凝聚力的最佳秘方，古今中外皆然。Renan 在其〈何謂國族〉的知名演說中便曾有名言：「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國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它〔對公民〕施加義務，要求同心協力。」(Renan 1990 [1882]: 19) 戰禍總是帶來人民的死傷、財產的損失與家園的破壞。戰爭之框一方面要保護框內人民的身家財產安全，一方面要為已經產生的禍害與死傷提出解釋。除了苦難所造成的「受害者」意義外，戰爭還需要英雄、需要鬥士，也需要殉道者(烈士)。戰爭之框要深沉地哀悼苦難死亡，更要激憤昂揚，尋求救贖。因此，戰爭之框不只是一種暫時的「情境定義」而已。作為一種關涉到人的個體生命的終極存在——生與死——以及集體暴力的極端形式可能帶來的災害與苦難，戰爭之框必須承載極為沉重的意義，背後或多或少必然隱含一種神義論(theodicy)，為人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不公不義、苦難與傷亡提供最終的補償與救贖。在過去，這種神義論大多由宗教提供；在現代，民族主義成為神義論的主要來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可說是現代社會的宗教。幾乎所有現代民族國家都歷經不同程度的戰爭或集體暴力(如內戰與革命)的洗禮，也都有其哀悼、紀念乃至祭祀的儀式⁸。

戰爭的名稱，也是戰爭之框的反映。同一場戰爭，交戰雙方的命名方式很有可能極為不同。當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

⁸ 值得注意的是，在悼亡與紀念方面，西方與非西方似乎也存在一種時間差。歐洲為戰死者悼亡紀念的高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則是在二戰之後。參見 Mosse (1990)，Winter (1995)，高橋哲哉 (2007, 2008)，子安宣邦 (2004)。關於這個差異，第四節將進一步探討背後的意涵。

爭」在戰後被改稱為「太平洋戰爭」時，戰爭之框已經改變了（見下節討論）。戰爭之框既然提供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框架，其作用猶如孔恩所稱的「典範」（paradigm, Kuhn 1969）。不同的典範之間可能是「不可共量」的，戰爭之框也是如此。不同的戰爭之框，可以相互連結，但相互敵對的戰爭之框，則往往是不可共量的。戰爭之框與一般所稱的「史觀」不同，在於其所強調的不僅只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理解世界的基本架構，包含了意義、價值、生死觀等。不同的觀點之間或許可以相互包容，但相互衝突的戰爭之框間卻是不可共量，也難以彼此包容的。

作為一種認知框架，戰爭之框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也值得進一步探究。認知框架本身並不是意識型態，它可能受到既有的意識型態形塑影響，但也有可能透過有意識的建構而發展出新的意識型態⁹。和 Bourdieu (1977) 的生存習性 (habitus) 的概念類似，戰爭之框同時有可能「框構與被框構」(framing and framed)。在某種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意識型態可以為戰爭之框「定調」（例如軍國主義的意識型態將「大東亞戰爭」定調為「聖戰」）；而當意識型態發生轉變，戰爭之框也可能被「再定調」（如下文所討論的日本戰後出現的「和平基調」）。再如，當代中國的戰爭之框，受到長期以來的帝國意識與天下觀影響，因此會特別強調洗刷戰敗的恥辱、恢復昔日的榮光，再加上「戰爭共產主義」（見本書第二章）意識型態的影響，使得戰爭之框更加牢不可破。

9 在社會運動的文獻中，認為框架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很難被以機械、單向的方式來界定。參見 Oliver and Johnston (2000), Snow and Benford (2000), Snow (2004)。

框架並不是一種本質性的存在，因此在社會運動中，框架可以被動員、重組、聯合、挪用。就個人層次來說，作為一種組織經驗與定義情境的原則，框架可以被建構，更可以被傳承、習得、採用。在基本的微觀互動中，一個人在面對他者時，他／她要如何與對方互動，取決於其認知框架。如果他將對方視為敵人，那麼他會採取對抗或競爭的行動；如果他將對方視為朋友，那麼他會採取友善或互助的行動。

相互衝突的框架彼此不可共量，但人們可以選擇給框架重新定調、跳脫框架，或是拆散框架。在某些情境下，跳脫框架並非易事，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儘管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例如在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時，國內並非完全沒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反戰者往往被「消音」甚至被迫「轉向」，否則可能面臨牢獄之災¹⁰。在現代民族國家，戰爭之框可能被制度化或常態化，透過教科書、電影電視、歌謠戲劇、紀念碑、博物館等各色各樣的媒介散播複製，代代相傳。因此，戰爭之框並不是只有經歷戰爭的人才擁有，也會傳承給未曾經歷過戰爭的世代。反過來說，經歷戰爭的人也許已經放棄以戰爭之框來看待事物，但沒有經歷戰爭的人反而有可能執著以戰爭之框來看待世界。在集體的層次，戰爭之框可能構成了某個社會的基本框架，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成員都無法從這個框架跳出來。戰爭之框的概念對於我們理解戰爭遺緒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提醒我們，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在物質、資源、人力動員等事情

10 「轉向」是日本戰時與戰後知識思想界的一大課題，許多左派的反戰分子或出於被迫，或出於自願，紛紛轉向支持戰爭，而這也導致了敗戰之後許多人對於未能堅持立場的悔恨心情。參見鶴見俊輔 (1982)。

上面，而更在認知與精神層面。這些影響也不是暫時的，不會隨著戰事結束而消失；相反地，這些認知與精神層面的影響會因為戰爭之框而持續到戰後，甚至深刻地形塑人們的生命觀與世界觀。戰時這種「你死我活」的戰爭之框，並不會因為戰爭結束就銷聲匿跡。在民族主義的時代，以民族為名而進行的戰爭，戰爭之框也成了「國族之框」。戰爭之框在戰後經過制度化而成國族之框，形成了一種以國族為中心的世界觀或「國族觀」(nation view, Duara 1995, 汪宏倫 2001)，提供人們理解國族、界定自我與他者的框架。在此意義下，國族之框可說是一種戰爭遺緒。即使戰爭結束，關於戰爭的詮釋、戰史的書寫、戰爭的記憶，戰爭之框仍會以國族之框的方式繼續起作用。由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背後都牽涉到不同程度的戰爭暴力，因此我們可以說，大部分的民族主義背後都隱含(或至少曾有過)一個或多個戰爭之框。

從戰爭之框到國族之框，並不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必須在物資、人力與精神上不斷地動員才有可能達成。本節一開始所提到的種種機制(資源榨取、徵兵動員、公民規訓、生命治理)也都必須發揮作用。此外，無論戰爭之框或國族之框，涉及的都不只是人，還有領土。土地的價值甚至高過於人的生命，因此為了「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人的生命是可以被犧牲的。即使是在同一個國族之框內部，為了維護領土的完整(以及國家主權的遂行)，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生命也會變成「不值得悲傷的」，形成「框內之框」。這在許多現代國家的邊陲地區，包括日治時期的台灣、朝鮮，當代中國的新疆與西藏，這樣的例子都數見不鮮。這牽涉到現代國家的內部暴力，將在第四節中進一步討論。

戰爭之框不必然只牽涉到某一個特定的戰爭；和社會運動的框構過程一樣，戰爭之框會隨著敵人的改變以及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不同的戰爭之框也可能存在聯合放大的效果¹¹。但唯一不變的是，戰爭之框必須合理化戰爭及其結果。暴力的結果經常是任意專斷的(arbitrary)，作為一種集體暴力，戰爭也是如此。然而，戰爭之框與國族之框卻不接受戰爭及其結果的任意性；相反地，它們拒斥戰爭的任意性，反而想要從國族的歷史敘事賦予這些任意性相應的意義。因此，無論戰勝或戰敗，結果都不是任意的，而必須被戰爭之框與國族之框納入解釋。生命不能無故犧牲，鮮血不能任意白流，民族主義的神義論就在此發揮作用。蒼生不能無端受苦，犧牲必須有所回報：現在的犧牲是為了後世子孫的幸福，而繼起的國族成員則保證將會永遠紀念那些被犧牲的生命。國族的建構成了救贖的來源，這是為什麼民族主義特別看重新生、死亡與紀念(Anderson 1998)。

總結來說，戰爭之框不僅區分敵我、鞏固內部，還必須提供救贖，對戰爭的任意性賦予意義，更要合理化暴力的使用。歌頌暴力，表彰烈士英雄，鼓吹犧牲生命，都是戰爭之框所必須樹立的價值觀。自18世紀後半以降，以「建立民族國家」為訴求的國族主義，是戰爭之框的主要基調，這股經過戰爭歷程來建立民族國家的熱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達於頂峰。二戰之後，歷經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與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毀滅浩

11 關於框架在社會運動過程中的聯合(alignment)與放大(enlarging)效果，可參見 Snow et al. (1986)。同樣地，戰爭之框也存在著類似的框構過程。

劫，歐洲各國間力求和解，嘗試以區域整合來超越民族國家，而殖民主義在亞非各地節節敗退，戰爭之框也不再以國族主義為基調。冷戰時期，是以「共產集團」對上「自由民主陣營」為主要的框架，而在冷戰結束後，強調的則是人道主義與所謂「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反恐、人道救援等）。在東亞，以國族主義為基調的戰爭之框仍主宰著這個地區的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對現在的認識、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而這也是當今東亞局勢充滿潛在的衝突與緊張的來源。以下，將針對日本、中國與台灣的戰爭之框，分別析論。

三、東亞的「戰爭之框」：日本、中國、台灣

東亞的近現代史可說是一部被戰爭打開的歷史，因此東亞諸國之中都存在著不同的戰爭之框。本節以日本、中國與台灣為例來檢視存在此一區域的幾個重大的戰爭之框。限於篇幅，下面的討論只能以一種韋伯式的「理念型」方式勾勒每一個戰爭之框的大致輪廓與特質，儘管現實中這些戰爭之框的具體呈現與表述，往往比本文所勾勒的要遠為複雜許多。

（一）日本：從「大東亞戰爭」到「太平洋戰爭」與「和平基調」

和大多數的國家一樣，日本的現代國家形成，和一連串的戰爭及戰爭威脅有關。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清廷的敗北給日本幕府帶來了警訊，1853年的「黑船來航」事件則把西方殖民者的戰爭威脅直接帶到江戶灣。江戶幕府在中國鴉片戰爭的前車之鑑，以及迫在眼前的軍事威脅的情況下，接受美國的「警告」，結束鎖國政策，而有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的「開國」。

日本的現代國家形成，雖然不像中國烙著一連串戰敗恥辱的印記，但刺激其開國並採取維新政策的最終因素，終究仍與戰爭有關。和中國相較，日本的戰爭之框一開始僅是隱而未顯，雖然黑船來航並未帶來真正的戰爭，但戰爭的威脅與清朝鴉片戰爭的慘敗教訓，已經讓幕末菁英有所警惕，最終促成大政奉還，開啟明治維新，邁向現代國家的建設之路。此後，日本接連在日清、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帶給日本政府與國民無比的自信，對於日本近代民族國家的肇造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意義。在日清戰爭中，日本打敗昔日盟主，一躍而成為新的區域強權，更獲得了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台灣，也為日後併吞朝鮮預先鋪路。日俄戰爭則是證明（東方的）黃種人能夠打敗（西方的）白種人，使日本正式加入列強之林。對於急於「脫亞入歐」的新興日本帝國來說，要合理化這兩場戰爭並不困難。「文明開化」意味著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價值觀，而先進強大的武力正是文明開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一個國家要達到文明開化，必要提振軍力向外擴張，這是西方先進諸國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作為後進國的日本也有樣學樣。日本後來發動滿洲事變、支那事變、珍珠港事變，企圖擴張版圖，卻也一步一步陷入戰爭的泥淖，最終以敗戰收場。戰後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產生了鉅大的變化，可以說是戰爭遺緒所造成的結果。

簡要地說，當前日本存在著兩個對立的戰爭之框，即「大東亞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兩種戰爭之框，以及一個試圖拆解所有戰爭之框的「和平主義」基調。這「兩個戰爭之框與一個基調」的形成，各有其歷史脈絡與問題，以下僅能簡略勾勒其大致樣貌。

(1) 大東亞戰爭之框：

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政治菁英戰戰兢兢地向西方學習，一心趕上歐美列強，唯恐淪為列強的殖民地。當時整個時代的氛圍是「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西方列強在亞洲採取豪奪，日本要避免成為列強的俎下之肉，除了要效法歐美，更要盡快擺脫亞洲的「惡友」，免受其牽累（福澤諭吉 2003：265）。經過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改革，日本帝國軍力大幅提升，接連打敗大清帝國沙俄帝國，日本的現代國家建造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為了合理化這個階段的戰爭，日本除了延續日俄戰爭時期的「自衛戰爭」的說法外，更加入了「殖民地解放戰爭」的說法。日本一方面想效法列強，和列強在世界舞台爭一席之地，一方面對亞洲近鄰又以文明開化的指導者自居，要幫助亞洲從西方白種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來。「大東亞戰爭」即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這種說法對於不滿西歐近代文明的知識分子尤其具有說服力，我們從「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與「近代的超克」這兩場被認為是替日本軍國主義擦脂抹粉的著名論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¹²。這也就是竹內好後來在重提「近代的超克」這場座談會時提到的大東亞戰爭的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對殖民地的侵略戰爭，一方面是抵抗帝國主義的戰爭（竹內好 2005：322）。竹內好引述了多位曾經參與「近代的超克」的作者來說明戰爭的二重性，但其實我們從竹內好自己在珍珠港事變、日美開戰之後所寫的〈大東亞戰爭與吾等之決意〉，也可以看得十

12 這兩場座談會的紀錄，參見高坂正顯等（1943），河上徹太郎、竹內好（1979）。

分明白：

歷史被創造出來了！世界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面貌！我們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十二月八日，當宣戰的詔書頒布之時，日本國民的決意匯成一個燃燒的海洋。心情變得暢快了。……建國的歷史在一瞬間盡數閃現，那是不必說明的自明之事。有誰曾預想到事態會進展為這樣的局面呢？我們在戰爭爆發前夜仍然相信戰爭是應該盡量避免的。我們只想到戰爭悲慘的一面。其實，這種想法本身才是悲慘的。那是卑微、固陋、被禁錮著的想法。戰爭突然降臨，在那個瞬間，我們了解了一切。（竹內好 2005：165；黑體為筆者所加）

從東亞驅逐侵略者，對此我們沒有一絲一毫進行道德反省的必要。敵人就應該快刀斬亂麻地徹底消滅。我們熱愛祖國，其次熱愛臨邦；我們相信正義，我們也相信力量。大東亞戰爭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變，使它在世界史中獲得了生命；而現在使大東亞戰爭本身得到完成的，應該是我們。（竹內好 2005：167；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兩段文字讓我們看到「大東亞戰爭」之框如何在知識菁英階層確立的過程。在一開始，日本國民與知識菁英對於日本為何涉入在中國的軍事行動，其實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的。因此竹內好提到，在日美開戰之前，心情極為鬱悶，也認為戰爭應該避免。然而，日美開戰之後，心中的陰霾一掃而空，一種新的戰爭之框出現，戰爭被提升到世界史的高度，有了新的意

義。竹內好和眾多日本國民一樣，在「戰爭降臨的瞬間了解了一切」：原來日本的戰爭是為了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把白種殖民者從亞洲驅逐出去。此時戰爭不但不應該避免，而且更要積極參與，因為「我們相信正義，我們也相信力量」，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就應該大刀闊斧地掃除，「敵人就應該快刀斬亂麻地徹底消滅」。

和許多曾經支持納粹或法西斯、卻在戰後極力遮掩湮滅證據的人相較，竹內好並未嘗試遮掩他在戰時這段從戰後看來並不光彩的言論。竹內好在戰後被視為具有批判性的進步知識人代表，但即使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戰時也不免深受「大東亞戰爭之框」的鼓舞與影響。這個戰爭之框深入人心，一直到戰後新民族主義的熱潮仍被不斷複製。

為了動員人民效忠國家、參與戰爭，日本自明治時代便頒布《軍人勅諭》(1882)與《教育勅語》(1890)。這兩份文件是軍國主義教育的兩大支柱，要求人民效忠天皇，必要時更必須犧牲自己的性命。至於那些為天皇而戰死的人，則被奉讚為神，以「英靈」之名供奉在靖國神社當中。在大東亞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戰死者被迎入靖國神社，並舉行多次臨時大祭加以追悼感謝。透過這些祭典，家屬們對戰死的悲傷被轉化為「光榮犧牲」的喜悅，原本「一無是處」的平凡生命，因為得到天皇的肯定與國家的褒揚而變得有價值起來¹³。

13 高橋哲哉(2007)將此過程稱為「感情的鍊金術」。事實上，這種「感情的鍊金術」不只存在日本或靖國神社，也存在許多民族國家的悼亡與紀念儀式中。民族國家透過動員、戰爭、悼亡等過程，將一般的泛泛之眾(mass)變成國民(citizens)甚至「烈士／英靈」，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看得特別明顯(Mosse 1990)，而這些紀念與悼亡儀式，

日本敗戰之後，這個大東亞戰爭的識框曾經銷聲匿跡過一段期間，尤其在美軍占領時期，即使「大東亞戰爭」的名稱都被視為禁忌，必須改為「太平洋戰爭」(詳見下述)。然而，大東亞戰爭的識框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隨著日本保守派政府的重新掌權而繼續存在，反映在戰後諸多右翼民族主義者的言論當中。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1964)，可說是戰後重新回復「大東亞戰爭之框」的早期代表。至於小林善紀的《戰爭論》(1998)，則是將此一戰爭之框以漫畫的方式通俗化與普及化，在1990年代新民族主義的浪潮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林房雄將大東亞戰爭的起源回溯到弘化元年(1844)，德川幕府決定在東京灣以及其他地區的沿岸建立炮台以防止美、英、法等國商船開港通商的要求。這個年份，比起一般認為促成日本近代開國、刺激明治維新的「黑船來航」事件，還要早了將近十年。從這個框架來看，日本自19世紀以來從事的一連串戰爭行為，都是出於自衛，而非侵略。而日本之所以進軍中國與東南亞，純粹只是為了把白種殖民者逐出東亞地區，從而建立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根據這個識框，日本非但不是什麼侵略者，而且還是「被壓迫者」與「受害者」，尤其廣島與長崎的原爆經驗，使日本成為「人類史上唯一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民族；這種「受害者意識」，一直是戰後日本國族認同裡很重要的組成要素。既然日本發動戰爭是出於「自衛」、「被國際情勢所迫」，而最終結局是被打敗，成為受害者，那麼日本自然無

並不純然是現代的發明創造，而是與社會原有的宗教傳統有所關聯(Winter 1995)，這也說明了，日本的「感情鍊金術」現象並不是那麼特殊。

需為任何戰爭行為道歉，也無責任可言。日本如果有任何錯，在於輸掉戰爭，因此也輸掉了詮釋戰爭的話語權。換句話說，因為輸掉戰爭，戰爭之框也被改變了。因此日本必須做的並不是認錯道歉，而是重新奪回有關戰爭的話語權，並修改「和平憲法」，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參見下文討論）。這是戰後日本右派與保守派所一再重複的論調。大東亞戰爭之框在戰後美軍占領期間雖然被極力拆解，但在靖國神社與遊就館這樣的地方，大東亞戰爭之框仍被制度化而保存下來。1990年代引起軒然大波的《新歷史教科書》，也是嘗試在教育體制中延續這種戰爭之框。

(2) 太平洋戰爭之框：

第二種關於戰爭的識框，可稱為「太平洋戰爭之框」。日本戰後主流社會對戰爭的態度與評價倏忽一變，與戰前相比可說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彎，這個轉變並不是來自任何精神上的啟蒙或思想上的突變，而是來自「敗戰」這個沉重的一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正式宣告戰爭結束。以美軍為主的盟軍部隊進駐東京，開始為期長達六年七個月的美軍占領時期。在這段期間，美軍的首要任務便是徹底摧毀日本的軍國主義與戰爭機器，原先的「大東亞聖戰」之框當然也必須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勝利者美國的「太平洋戰爭」之框。戰爭不再是國民的驕傲與統治者的合法性來源，而是失敗與恥辱的印記。歷史被重新改寫，而且必須按照勝利者的語言及觀點來記述。不只是歷史，整個價值觀與世界觀被頭下腳上地顛倒過來了：原來的善變成惡，原來的惡變成善。少數政治人物與軍事領袖（而不是人民、更不

包括天皇)被認為應該對戰爭負責，其中一部分被當成戰犯送審，是為著名的「東京審判」¹⁴。「放棄戰爭、不保有武力」的條文被寫入憲法，「和平主義」取代軍國主義，一變而成為戰後日本的「立國精神」。

這一切戲劇化的轉變之所以可能發生，完全不是來自內部深刻的反省批判，而幾乎可說是在美國以高傲的戰勝者姿態指使與策劃之下完成。當然，戰前日本也有反戰的思潮，也有批判軍國主義的聲音，但這些都在軍政府的高壓統治下被迫噤聲乃至轉向（鶴見俊輔 1982）。也有為「和平憲法」辯護的人指出，日本在戰前就有非戰主張與和平主義思潮，和平憲法只是體現了日本戰前被壓抑的理想，並不完全是被美國「強押著走」（山室信一 2007）。然而，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這一切之所以可能發生，日本之所以有「戰後」，都是因為另一個強權——美國——靠著優勢的武力，將日本徹底擊潰。如果沒有美國的軍事「解放」，左派與和平主義的思潮幾乎沒有在日本出現的機會。

如前所述，「太平洋戰爭」是美國對二戰期間太平洋對日戰線的稱呼，而這個識框在戰後也因美軍的勝利被帶入日本。在美軍占領期間，盟軍總部首先禁止使用「大東亞戰爭」的名稱，並在主要報紙連載了《太平洋戰爭史》，而後更集結成書，分

14 這些戰犯有些被處以絞刑，有些則安然無恙，最後甚至復出日本政壇，再度掌握權力（最有名的例子是岸信介，2006年後兩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即為其外孫）。東京審判的過程充滿了盟國（尤其美方）的便宜算計，其正當性與妥適性事後同時遭到來自左派與右派的質疑，也成了日本戰爭遺緒的重大爭議之一。參見 Minear (1971)，牛村圭 (2005)，高橋哲哉 (2007: 43-45) 等。

發給中學生閱讀。太平洋戰爭之框讓人們相信，日本發動戰爭乃是一小撮懷抱野心的軍人與政客共謀的錯誤決策，絕大多數的老百姓都是無辜的，只是被政府所欺瞞而協助戰爭，因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包括教育改革在內，占領期間所施行的各種改革，奠定了太平洋戰爭之框的制度基礎，而 1960 年代之後，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關係，更是讓「太平洋戰爭之框」顯得理所當然，畢竟日本已經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太平洋戰爭之框可說是戰後日本社會的主流，但其本身卻隱含了不少問題。首先，將戰爭的名稱從「大東亞」改為「太平洋」，等於是把視線從日本左側的亞洲大陸轉移到右側的太平洋，而其結果便是使日本把戰爭的焦點放在與美國的戰爭之上，而忽略（甚至忘卻）了日本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拓展殖民帝國的問題。再者，以美國為主要對手的太平洋戰爭在 1941 年才開打，但日本所從事的戰爭，其實可以回溯到 1931 年的滿洲事變（中方稱「九一八事變」）。把戰爭責任歸諸少數軍部與內閣成員，也使得一般老百姓失去反省身為國民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應負的責任。

為了避免上述問題，有了「十五年戰爭」與「亞洲太平洋戰爭」（アジア・太平洋戦争）的說法。「十五年戰爭」是鶴見俊輔於 1982 年的《戰時期日本精神史》書中首先提出，後來為部分學者所採用，成為取代「太平洋戰爭」的另一種說法。鶴見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應該從 1931 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所引發的中日戰爭開始算起，至 1945 年日本戰敗為止。在這十五年間，日本國內外局勢均發生重大變化，而這場戰爭也被稱為「十五年戰爭」。1990 年代以後，有些學者則倡議用「亞洲太平洋戰爭」來取代「太平洋戰爭」，其用意也是在平衡「太

平洋戰爭」一詞所造成的偏頗（木坂順一郎 1993，倉沢愛子等 2005）。和「大東亞戰爭之框」相較，無論「太平洋戰爭」、「十五年戰爭」或「亞洲太平洋戰爭」的識框都更傾向於承認日本所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性質，也更願意反省日本在戰爭期間所犯下的罪行及其責任。

（3）和平基調（pacifist key）：

和平基調基本上反對戰爭，也不以戰爭之框來看待世界；無論過去的戰爭被理解為「大東亞戰爭」還是「太平洋戰爭」，和平基調都希望將之拆解轉化，變成「未來不再從事戰爭」的誓言。和平基調不僅只是一種反戰的和平主義思潮或主張，而是具有相當明確的制度基礎。除了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不保有武力」、「否定交戰權」外，和平教育也是學校教育的主流。和平憲法的制定與和平教育的推行，固然與美國在占領時期所主導的戰後改革有密切關係，但和平思潮能在戰後日本社會生根，與日本的敗戰經驗及普遍的受害者意識有關。除了社會各階層對戰時生活的艱苦記憶外，廣島、長崎作為國族創傷（national trauma）的象徵，更是受害者意識的重要來源。「人類史上唯一被原子彈轟炸過的民族」的傷痕被反覆強調，成了戰後日本國族認同的重要標誌（Saito 2006, Orr 2001, Yoneyama 1999, Igarashi 2000）。這種「戰爭的受害者意識」，配合上「放棄發動戰爭、不保有武力」的和平憲法，「熱愛和平、反對戰爭、誓言不戰」的和平主義思潮似乎也成了戰後日本社會的主流。

和平基調試圖拆解所有的戰爭之框，看似化干戈為玉帛，但其實背後也是問題重重，充滿矛盾與衝突。首先，和平基調

可說是「太平洋戰爭之框」的衍生物，畢竟和平基調的制度基礎——和平憲法——是在日本戰敗、美國占領之後才有可能出現。儘管許多論者嘗試指出，日本在戰前即有和平主義的思想，和平憲法不能完全說是外來的產物，但也有不少人主張，和平憲法是「在武力的脅迫下被逼著放棄武力」，可以說本身即充滿了矛盾與扭曲（ねじれ），也是造成日本戰後政治與社會諸多問題的來源（加藤典洋 1997）。

再者，和平基調在日本國內雖有制度基礎（即使這個制度基礎被認為充滿扭曲而受到質疑），在國際上則不然。國際之間仍把戰爭視為解決某些問題的合法手段，而絕大多數的國家也都保有軍事武力。即使日本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不保有武力」，也仍擁有自衛隊，造成名實不符的問題，引發更多的扭曲與紛爭。此外，和平教育傾向於避重就輕，較少深入探討發生戰爭的結構性因素，只一味強調戰爭的悲慘與禍害，教導人們厭惡戰爭；然而，如何從結構上避免戰爭、預防戰爭的發生，和平教育卻較少提及。這使得和平教育在現實政治中顯得蒼白軟弱，也很容易成為右派攻擊的對象¹⁵。面臨現實主義當道的國際局勢，和平主義的主張其實顯得相對空洞無力，它只是不斷地強調戰爭所帶來的悲慘禍害，告誡人們勿重蹈覆轍（誰的覆轍？），不要再從事戰爭。但是，對於戰爭起因、責任歸屬等問題，則是避重就輕，甚至刻意模糊¹⁶。儘管有著美好的理想與

15 事實上，不僅右派，左派在戰後初期對於空洞軟弱的和平教育也有相當多的批判。參見小熊英二（2002：359-368）。

16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廣島原爆紀念碑的碑文，最後一段寫著：「安息吧！因為錯誤將不再重複。」這段話沒有主詞，因此留下不同詮釋的空間。究竟是誰的錯誤、誰將不再重複錯誤，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可以

動人的口號，和平基調卻無力挑戰主流的民族國家軍事體制，也無法改變國家作為「壟斷合法暴力」的現代政治組織型態。

上述各種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便是名實不符，徒有和平憲法之名而卻保持擁有軍隊之實（儘管以「自衛隊」為名），而且在軍事戰略上成為美國的附庸。日本的和平必須仰賴美國，極具爭議的「美日安保條約」，等於是將日本納入美國的戰爭之框裡。這一連串的扭曲，造成日本戰後政治體制與民族主義爭議擾攘不安的根源。

上述的「兩個框架與一個基調」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戰後日本許多與民族主義相關的爭議事件，包括教科書問題、歷史認識問題、靖國神社問題等。在敗戰之前，戰爭之框等於國族之框，但是在敗戰之後，原來的「戰爭之框＝國族之框」被拆解翻轉，在此情況下，如何解釋敗戰，如何面對敗戰的事實並賦予意義，如何詮釋日本過去發動的戰爭，如何重新界定日本的國族，成了日本戰後政治界、知識界與文化界極大的課題，也是諸多重大政治與社會分歧的所在¹⁷。1990年代起出現的「新民族主義」（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以「歷史修正主義」的面貌出現，而其中一大半的爭議是環繞著戰爭，可說毫不令人意外¹⁸。

許多被稱為進步與批判的知識分子都曾撰文批判民族國家的建國神話，嘗試拆解目前還殘存在日本國內的（大東亞）戰爭

有不同解讀。

17 關於此可參見 Dower（1999），Seraphim（2006），小熊英二（2002）等著作中的討論。

18 其中較知名的例子除了先前提到的《戰爭論》小林よしのり〔小林善紀〕外，尚有西尾幹二（1999）《國民的歷史》，藤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1996）《教科書沒教的歷史》等。

之框（高橋哲哉 2007, 2008，子安宣邦 2004）。但這些批判大多僅針對日本，而不是對所有其他國家一體適用。這種不對等的批判，更是無法進入應該被批判的對象——民族主義者——的耳中，反而更加深他們的不平，也落實了他們的指控：只清算戰敗的日本，不敢清算其他強權，日本才是受害者。勝者的正義談不上正義。

正如竹內好在〈大東亞戰爭與吾等之決意〉所說，「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從東亞驅逐侵略者」，日本對此「沒有一絲一毫進行道德反省的必要」。戰後日本民族主義者也持續相同的看法。退一步說，日本發動戰爭，充其量僅是效法列強的行徑而已，僅僅是因為敗戰，便要日本負擔所有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者的罪虐，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是極不公平的。如果要日本承認戰爭的罪惡與錯誤，那麼，不去追究那些比他們發動更多戰爭、屠殺更多人民，甚至最後將日本慘重擊敗的美國與西方殖民者的戰爭罪責，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事。如果歷史的解釋權是靠戰爭勝利才能奪取，日本自然沒有必要自甘居於戰敗的弱勢，而必須重振武威雄風。換句話說，對於大東亞戰爭，日本如果有什麼需要反省檢討之處，在於「戰敗」，而不是在於「做了應該道歉的錯事」。從這個角度看，日本非但無須與鄰國妥協，也不必為任何事情道歉。

除了層出不窮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之外，包括日俄戰爭之內的戰爭之框仍不斷被重新建構，例如司馬遼太郎（1978）著名的歷史小說《坂上之雲》便是以日俄戰爭為主題，描繪日本在明治時期如何面對西方列強奮起直追的故事。這部小說原來自 1968 年至 1972 年在《產經新聞》上連載，由於小說中對明治時期的日本有高度評價，把日俄戰爭描繪成一種面對列強環伺不

得不採取的「自衛戰爭」，引發評論者對司馬遼太郎的質疑，認為這部小說有美化戰爭、歌頌軍事英雄的嫌疑，論者以「司馬史觀」稱之並加以批判（小森陽一 1998，成田龍一 1998）。這種對（日俄）戰爭詮釋的方式影響到後來的「自由主義史觀」與接踵其後的《新歷史教科書》，引發更大的風潮與更激烈的爭辯¹⁹。儘管如此，日本放送協會（NHK）仍舊大費周章地將《坂上之雲》改編成「大河劇」，除了破規格動員大批人力物力，同時大張旗鼓地自 2009 年起分三年，在每年年底時高調宣傳播放。這些例子在在說明戰爭之框不會隨著戰爭結束消失，而會不斷地被重新建構與挪用。

（二）中國：推倒「三座大山」、洗刷「百年國恥」的戰爭之框

和日本相較，現代性在中國的開展，同樣也始於 19 世紀中葉，也是在西方的堅船利炮強行叩關之下而發生的。不同的是，當時的滿清王朝面臨的不僅是戰爭威脅，而是一連串敗戰、割地賠款與不平等條約的恥辱。滿清王朝的覆滅並沒有讓中國立即蛻變成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而是陷於長時期的內部分裂與更多的戰亂。近代中國，可說是一連串戰爭與革命所打造出來的。從 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中國有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陷在長期戰亂之中（Zarrow 2005）。這些大小、規模、期間不等的大小戰爭，因參與的主體不同，自然也有許多不同的「戰爭之框」，其中兩個最主要、也最具有代表性的，非國民黨與共產黨莫屬。

¹⁹ 有關「自由主義史觀」與《新歷史教科書》的來龍去脈與其所引發的風潮，可參見汪宏倫（2010）。

這兩個戰爭之框代表兩種對戰爭的詮釋方式，他們不但有著不同的建國圖像，而且彼此相互敵對。一直到 1949 年，共產黨取得全面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戰爭之框與國族之框始定於一尊。

相較於日本戰後之框的破碎扭曲，當代中國的戰爭之框呈現另一種光景，是一個從敗戰恥辱到光榮勝利的光明故事。一個典型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必然從 1840 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講述起，歷經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甲午戰爭、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其間伴隨著種種不平等條約、外國軍隊的燒殺擄掠、資產階級與反動政權的無情鎮壓、日軍的殘酷暴行等。而到最後，則是以解放戰爭的勝利與共和國建立為終點，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做為結論²⁰。整個新中國的建立，是立基在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戰役之上。中共以武裝鬥爭起家，對於軍事行動與暴力抗爭給予極高的評價。當代中國的建國神話，戰爭與革命是絕不可少的核心要素。

在塑造中國的「戰爭之框」上，毛澤東無疑是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毛澤東師承俄共的「戰爭共產主義」（見本書第二章），主張以武裝革命奪取政權。他被吹捧為不世出的軍事天才，他的軍事戰略思想被深刻鑽研反覆探討，而他發表過的許多關於軍事與戰爭的名言，迄今仍被一再傳誦，歷久不

20 這裡討論的當然是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民族主義敘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版敘事，自然有所不同。國民黨版本的敘事更強調辛亥革命、北伐與剿匪，以及對日抗戰的領導角色。作為國共內戰的敗方，國民黨版本的民族敘事也有完全不同的詮釋，強調重點在未來的民族統一與復興，而其內容也隨六十年來海峽兩岸局勢的變化而有修正。詳見下節討論。

衰。毛澤東本人對馬克思學說雖然鑽研不深，但他對戰爭的看法，卻是典型馬克思主義的。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是如此看待戰爭的：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一切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人類的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屬於最後戰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所面臨的戰爭，毫無疑義又是最大的和最殘酷的戰爭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殘酷的非正義的反革命的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打起正義戰爭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受摧殘。人類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和中國人的大多數所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正義的戰爭，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世界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梁。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到了那時，什麼戰爭也沒有了，反革命戰爭沒有了，革命戰爭也沒有了，非正義戰爭沒有了，正義戰爭也沒有了，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於我們要求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這是區別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剝

削階級的界線。(毛澤東 1965：167-168；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段話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是「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戰爭」，也就是為了永久和平，正如同共產主義實現之後就不再階級壓迫，國家也將被取消一樣。這是一種以歷史的最終審判者自居、延續黑格爾到馬克思的目的論線性史觀。其二是毛澤東也把自己（共產黨）所領導的戰爭提升到人類史與世界史的高度，宣稱自己正在從事的戰爭對人類文明有所助益。雖然這樣的修辭也同樣常見於其他戰爭之框，不算特殊，但和第一點結合起來看，可說是一種典型的啟蒙以來的現代性論述。關於這點，我們將留待下一節進一步探討。

從「反圍剿」與「長征」開始，毛澤東發表過無數談話演說，為紅軍的戰爭定位，嘗試建立一個共產革命的戰爭之框。這個戰爭之框，隨著不同時期「統一戰線」的變化而有所修正²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以「新民主主義革命」來為前一個時期定調：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推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²²。這個戰爭之框所界定的敵人主要包括了代表帝國主義的日本與反動的

21 「統一戰線」其實正是一種戰爭之框的構聯或整併 (alignment)。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戰爭期間，原本處於敵對交戰狀態中的國共兩黨暫時停止彼此互鬥，聯合起來對抗日本。

22 「新民主主義」的說法最早見於毛澤東於 1940 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 1965：655-704)。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首次對中國革命的歷史提出分期，以「新民主主義革命」來與「舊民主主義革命」區隔。「舊民主主義革命」指的是 1919 年五四運動之前，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則是指 1919 年之後，由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革命。

國民黨政權。國民黨不僅是階級敵人，也是民族敵人，因為蔣介石與西方掛勾，背後有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三座大山」之所以被推倒，戰勝敵人之所以可能，一切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從這個角度看，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可說是建立在武裝抗爭與軍事戰鬥上，而其思想源頭，可追溯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建立的階級鬥爭與列寧式的革命路線上。「槍桿子出政權」，這句毛澤東一再被複誦的名言，言簡意賅地總結了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發展的教訓。暴力原來只是工具，但在當代中國的建國神話中，暴力變成了合法性的來源，暴力本身被合法化，成為國家本質的一部分了。這不僅是當代中國才有的現象，而是大部分現代國家都歷經的過程，也都具備的特質，只是在當代中國，這個特質看得特別明顯。

當代中國可說是一個從重重戰爭之框所精鍊鍛造出來的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因此它的國族敘事，必然充滿大量的戰爭記憶與軍事元素。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指導方針（如著名的《論持久戰》、「游擊戰十六字訣」等），已經成了當代中國建國神話的一部分，不僅官方喉舌長期提倡宣揚、學界不斷鑽研闡釋，即使尋常百姓也耳熟能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劃分，也成了官方的國族敘事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後各個階段的主要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被編成各種故事、教材、文學作品與電影，為老百姓所津津樂道。其中最知名的如《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等電影，還有《紅旗譜》(梁斌 2005)，《紅日》(吳強 1961)，《紅岩》(羅廣斌、楊益言 2000)，《創業史》(柳青 1960)，《青春之歌》(楊沫 1959)，《山鄉巨變》(周立波 1958)，《保衛延安》(杜鵬程 1956)，《林海雪原》(曲波

1959)等被稱為「紅色經典」的文學作品²³。解放戰爭中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更是被寫入教科書與通俗文學，也被拍成許多膾炙人口的影視作品。這些關於革命戰爭的記憶，並沒有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轉型而消褪，而是結合新興的消費趨勢與市場力量有新的發展。如19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期，曾經出現過一股將「紅色經典」改編為電影電視劇的浪潮。2005年官方開始推動「紅色旅遊」，嘗試結合觀光消費與市場經濟的力量來恢復戰爭與革命的記憶²⁴。透過這些文學、電影電視作品與旅遊消費活動，戰爭之框也滲入日常生活而被一再複製。

戰後日本的主流戰爭記憶，大多是追悼戰爭的受難者。只有在靖國神社（以及分散各地的護國神社與慰靈碑等）這樣的地方，才見得到這些歌頌戰爭與紀念英靈的論述與活動。在中國，歌頌戰爭則是常態，烈士與英雄（英烈）這類的修辭隨處可見。共和國建立之後，傳統上應當祭祖的清明節，被拿來紀念烈士，這背後的邏輯再清楚不過：共和國能夠建立，是這些烈士勇敢拋頭顱、灑熱血，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才可能達成。如果共和國有所謂「祖先」可言，那麼這些前仆後繼犧牲生命的烈士

23 可被稱為「紅色經典」的作品其實還有不少，其中以這八部作品知名度較高，為那些曾經經歷革命戰爭世代的人所熟知，甚至得到「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的合稱。這些紅色經典有些雖然不直接與戰爭有關，但基本上都是以革命為背景。

24 「紅色旅遊」指的是到那些與革命戰爭相關的地點參訪旅遊，例如延安（抗戰時期共產黨根據地）、韶山（毛澤東的故鄉）、井岡山（紅軍最初根據地）等。結合紅色旅遊，還有大量紅色商品，將革命與戰爭記憶商品化。進一步分析，可參見 Wang (2012)。

們無疑非之莫屬。在著名的《為人民服務》講演中，毛澤東引用司馬遷，闡述了共產黨的生死觀：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裡，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裡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毛澤東 1965：1003-1004）

就像大部分共產黨所塑造的人民英雄一樣，張思德是一名普通的戰士，沒有顯赫彪炳的戰功；他甚至不是死在戰場，而

是在陝北燒炭時炭窯坍塌意外而死。毛澤東在他的追悼會上表揚他，發表了著名的「為人民服務」演說。為人民服務，推到終極是為人民而死。這可說是一種新的「神義論」或生死觀，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而死，就是「重於泰山」，要開追悼會紀念；反之，如果不是為人民服務、甚至是階級敵人的死，那就是輕於鴻毛²⁵。由於共產黨抱持的是無神論的立場，否認彼岸或來世的存在，也沒有祭祀的儀式，因此對於烈士的褒揚，主要是強調其事蹟「永垂不朽」，「永遠活在人民的記憶中」，而每年透過學校與單位動員的行禮如儀的紀念活動，也就顯得格外重要。Gellner (1983) 曾引用涂爾幹的說法，認為民族主義是自我崇拜的現代宗教，這個特質從民族國家的紀念悼亡儀式看得特別清楚：「人民」，也就是民族，成為新的神，人生最崇高的意義與價值，莫過於將生命奉獻給這個新的神。而作為民族代理人的國家，也有義務要為這些為人民獻身的烈士英靈建立祭祀殿壇，鼓勵人們繼續為國家民族犧牲奉獻²⁶。

儘管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超過三十年，許多人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已經難以為繼，民族主義與愛國教育成為新的意識型態基礎，但也正是因為如此，革命傳統與戰爭記

25 可與這種「戰爭之框」類比的是用來對付內部敵人的「鬥爭之框」，在文革時期發揮到極致：框外的階級敵人是「不值得悲傷」的生命，因此公開批鬥、羞辱、毆打、凌虐致死的例子數見不鮮。關於「戰爭之框」如何被轉化成「鬥爭之框」，參見汪宏倫 (2013)。關於「內部敵人」，可參見本書朱元鴻 (第二章)、姚人多 (第五章)。

26 關於國家與犧牲、祭祀等活動之間的關聯及其批判，可參見高橋哲哉 (2008)，子安宣邦 (2004)。高橋與子安的討論雖然主要針對日本，但其實其中所分析的普遍現象與原則，放在其他國家也適用。

憶再度被強調，甚至被提升到「精神文化遺產」的高度。歷經 1989 年的合法性危機後，中共自 1990 年代以來大力提倡愛國主義教育，除了學校的正式課程外，並積極採取各種手段擴大愛國主義教育的制度基礎，其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即為一例。根據筆者自行統計，在目前已公佈的 356 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中，高達 82% 以上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93 個) 直接與戰爭、武裝鬥爭或軍事有關²⁷。此外，框構集體記憶敘事的戰爭之框，也會隨著情境與時勢改變。1980 年代以前，有關戰爭的記述強調的較多是英雄的角色、犧牲的典範以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勝利榮光。1980 年代之後，側重苦難與悲慘面的「受害者記憶」開始大量出現，包括對「百年國恥」的重新強調，以及對日軍暴行 (如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等) 的刻畫描繪 (Callahan 2004, 2006, Mitter 2003, Denton 2007, Alexander and Gao 2007)。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了，戰爭與革命是當代中國重要的集體記憶，戰爭之框也不斷被加強與重塑。這種戰爭之框被延續到今天，成為人們理解兩岸局勢與「台灣問題」的基礎。從這個戰爭之框來看，台灣問題是甲午戰爭的遺緒 (被帝國主義割去土地的恥辱印記)，也是國共內戰的延長 (因美帝干涉而無法渡海解放台灣)。正因為台灣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象徵意義，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不願退讓，否則只是證實自己的軟弱，

27 這些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分別在 1997、2001、2005、2009 年分為四批公布，其中又以第三批 (2005) 當中戰爭與革命所占比率最高，將近 94%，主要原因在於該年正逢抗戰勝利六十週年，隔年則為紅軍長征勝利七十週年，中共官方特意凸顯此一面向。

還沒有強大到在軍事上可以收復失土的地步。台灣要冀望中國承諾放棄武力，基本上是極為困難（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武裝鬥爭是當代中國的立國根本，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來源。落後就要挨打（這句話現在被改成「軟弱就要挨打」），槍桿子才能出政權，這是當代中國無論官方或是民間都信奉不渝的鐵律。當前的民族主義者，無論像是《中國可以說不》（宋強等 1996）、《中國不高興》（宋曉軍等 2009）的作者們，或是網路論壇上不時發表激亢言論的「憤青」，動不動就是要和美國較量、要跟日本算帳、要用武力給台灣一點教訓，基本上都是用這種戰爭之框來看待世界²⁸。

中國的這個以漢人與「中華民族」為核心的主流戰爭之框，在國內也面臨不同框架的挑戰，主要的挑戰來源是包括新疆、西藏等原本位於帝國邊陲、在民族國家打造過程中被以武力或其他方式納入中國版圖的地區²⁹。在對外關係上，這個戰爭之框則經常成為中共官方與民族主義者看待世界事務的主要框架。在與日本的關係方面：中日戰爭的記憶與遺緒的處理，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所謂「歷史認識問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乃至近年來的釣魚島問題，抗日戰爭的戰爭之框一直起著深刻的作用。在與台灣的關係方面，如前所述，台灣問題被理解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殘留問題，1949年後兩岸對

28 有關毛澤東時期所樹立的戰爭之框與尚武精神如何影響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參見汪宏倫（2013）。

29 另外，國家對「內部敵人」所行使的暴力，包括反右、文革、六四、法輪功等，也是當前常被提出來批判的議題。然而，這些對中共國家機器內部暴力的檢討與批判，較少涉及國族的層次，也較少嘗試拆解既存的戰爭之框。

峙的情勢被理解為國共內戰的延續，背後也有帝國主義干涉的痕跡。因此，中共從來不曾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但如下節的討論所示，這樣的策略，卻也進一步鞏固了海峽對岸的戰爭之框。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國力增強、兩岸的局勢和緩，戰爭雖然不再是主調，但仍是重要的認識框架。中國一方面強調「和平崛起」，一方面仍舊持續擴充軍備、強調國防與軍事作為「民族復興」的重要手段，在南海問題與釣魚島爭端上屢屢採取強硬立場，說明了戰爭之框仍居於支配決策思維的主導地位。

（三）台灣：多重交錯、矛盾互斥的戰爭之框

台灣的戰爭之框，遠比日本、中國都要來得複雜許多。首先，近現代史中的台灣，鮮少以自身（即這塊土地及居住其上的人民）為主體從事過戰爭，少數稱得上的例外大概是 1895 年台灣民主國曇花一現的抗日戰爭，以及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初期遍布各地、規模不一的武裝抗日行動，其中最具有知名度的，又以 1930 年的霧社事件為代表。台灣民主國奉大清為正朔，大致上可視為中日甲午戰爭的延續；霧社事件則是一個前現代的部落社會對抗現代殖民國家的戰爭，由於武力懸殊等因素，最終以悲劇收場。霧社事件之後，台灣再也沒有出現過具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而隨著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東亞擴張，台灣也被整合進入日本帝國的戰爭之框，在皇民化運動時期達於高潮。二戰之後，台灣重新被劃入中國版圖，框外的敵人變成了框內的祖國，這個識框的轉換並不容易，過程也極不平順。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對於某些參與者與觀察者來說，毋寧是另一場對抗外來統治者的戰爭。1949 年，在國共內戰失利的國民黨政權遷台，從此台灣又被納入一個國共內戰的戰爭之框。這

個戰爭之框對台灣政治、社會乃至經濟與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都具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以上的簡要勾勒使我們發現，儘管台灣本土似乎並未歷經大規模的主權戰爭，但其實台灣的近現代史一直不乏戰爭的陰影與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台灣當前的國族問題——包括內部的統／獨、藍／綠、族群問題，以及外部的兩岸關係——其實都是 19 世紀以來一連串戰爭所留下的遺緒。這些戰爭所導致的版圖重劃與政權轉移，使得台灣也在不同的戰爭之框中被劃來劃去，一下子在框內、一下子在框外，而不同的戰爭之框之間，有的彼此敵對，有的則相互轉化變形。簡要地說，我們大致可以在當代的台灣，發現幾個不同的戰爭之框：

(1) (碎裂的)「大東亞戰爭之框」：

這個戰爭之框，可說是日本殖民統治的遺緒。儘管許多台灣人民並不願被捲入戰爭之中，但在二戰期間，不少台灣人或志願或被迫，以軍伕、軍屬、通譯、士兵等各種不同身分，參加了日本帝國的「大東亞聖戰」，則是不爭的事實³⁰。隨著日本戰敗與殖民帝國的瓦解，台灣的「大東亞戰爭之框」和其在日本本土的命運一樣，在戰後被有意識地拆解，取而代之的是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之框」。這同樣也是一個「典範轉移」的過程，原來在框外的「敵人」變成了框內的「祖國」。這個過程和日本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著明顯的差異。首先，和日本類似的是，戰後台灣也是以原來交戰敵手的戰爭之框來取代原有的戰爭之框，面臨「頭下腳上」的典範轉移。然而，台灣畢竟不是

30 台灣人的參戰經驗與戰時台灣社會的光景，可參見周婉窈(2003)。

發動戰爭的主體，而是被迫接受殖民主的戰爭之框，因此戰後要拋棄舊的框架，相對來說包袱較小。再者，和日本要面對一個種族、語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宗主國」(美國)相比，居台灣人口主流的漢人與中國大陸在歷史、文化、血緣上的聯繫，使台灣很容易認同這個原來在框外的「祖國」，即使台灣在被割讓時仍是由清朝統治，中華民國尚未誕生。因此，台灣毋須像日本在戰後經過一段漫長而痛苦的「擁抱敗北」的過程，而是歡天喜地「慶祝光復」³¹。弔詭的是，這個過程卻因為祖國的「抗日戰爭之框」，把台灣人視為曾被敵人的皇民教育所「毒化」、忠誠度可疑的二等公民，產生了諸多摩擦衝突。兩年後發生「二二八事件」，一種隱形的戰爭之框已然成形，從「本省 vs. 外省」逐漸變成「台灣 vs. 中國」。此點將於下文討論。

和日本當今仍舊殘存的「大東亞戰爭之框」不同的是，台灣所留下的大東亞戰爭之框，並不具有現實的實踐意涵，而主要在於對過去的記憶與詮釋。台灣畢竟不是發動大東亞戰爭的主體，只是被動捲入，而當前的台灣也鮮少有人嘗試去提倡、合理化過去那場戰爭。對那些曾經參與過以「大東亞」為名的戰爭的人來說，他們所難以忘懷的，與其說是對「大東亞共榮圈」的憧憬夢想，毋寧說是對青春歲月的懷念、以及戰場上一同出生入死的袍情誼。這些人有些或許仍抱著皇民思想、有些則未必³²。他們人生中的黃金歲月曾經消磨在一場殘酷的戰爭中，

31 此處必須強調慶祝光復的是漢人，因為「光復」的意識主要來自漢人的祖國想像，原住民族則缺乏此一意識。相反地，日本帝國是原住民族(日治時期通稱「高砂族」)所接觸到的第一個現代國家，因此他們對日本的忠誠，往往較漢人來得更高。參見黃智慧(2011)。

32 無可否認的是，台灣仍有部分老一輩世代的人，標舉著「大和魂」，緬

但在戰爭結束後，他們被「敵」、「我」兩個戰爭之框所排除摒棄。他們的記憶不被承認尊重，甚且求償無門。由於得不到兩邊的認可，他們對新舊兩個政權往往都心懷怨懟不滿³³。

歷史學者周婉窈曾在一篇關於台灣人參戰經驗的論文中提到：「差堪告慰和慶幸的是，台灣人雖然被動地參與日本的對華戰爭，但派遣到大陸的台灣人並不是荷槍實彈的軍人。」言下之意是說，由於台灣人與中國人沒有在戰場上互相殺戮，因此有利於（與外省人所擁有的）戰爭記憶的「整合」（周婉窈 2003：181）。不過，我們必須留意的是，戰爭之框最重要的作用在於劃清內外、區辨敵我，至於是否真的在戰場上交手廝殺，恐怕還是在其次。因此，即使台灣人在二戰期間沒有真的在戰場上與中國軍隊作戰，但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之框被界定為「敵人」，這對於日後獨派陣營形塑「中國」這個敵人，有相當

懷大東亞戰爭，甚至為之辯護。他們對過去歷史的解釋，以及對當前時局的看法，與採取「大東亞戰爭之框」看待世界的日本右派無異，兩者間也經常互相唱和。參見鄭春河（1995）。

33 關於這些通稱為「台籍日本兵」在戰後的遭遇，參見周婉窈（1997），蔡慧玉（1997）。另可參見本書第七章有關台籍戰犯的討論。另外，相較於上述男性，還有一群女性面臨的是深層的心理創傷，她們的記憶曾經得不到承認、自己也想要抹除。參見本書第八章有關慰安婦的討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學界在討論台灣人的參戰經驗時，似乎有意無意避開了具有爭議的「大東亞戰爭」，而採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或甚至自動轉換識框，採用日本戰後「太平洋戰爭」的說法。事實上，對當時參與戰爭的台灣人來說，他們所參與的是「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的說法對他們來說恐怕是陌生的。

的親近性³⁴。而統派陣營動不動把獨派形容為「日本皇民」，也是基於「大東亞戰爭之框」與「抗日戰爭之框」的對立而來³⁵。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所灌輸的大中國意識，獨派陣營往往避談「光復」而改稱「終戰」，因為台灣人很難在「戰勝者」或「戰敗者」之間定位，僅能以看似中性的「終戰」來指涉戰爭的終結。這個說法，在曾受日本教育、自認二十二歲前曾經是日本人的李登輝主政時期開始流行起來。然而，「終戰」的字眼畢竟與日本所採取的說法相同，引發反對者「皇民意識」或「殖民遺毒」的批評³⁶。

儘管「大東亞戰爭之框」在台灣並非主流，但這個識框仍舊影響著許多人的戰爭記憶，也屢屢引發爭議，例如高砂義勇軍紀念碑事件、高金素梅到日本靖國神社抗議「還我祖靈」，以及李登輝訪日時參拜靖國神社紀念其胞兄所引發的爭議等等。這個識框也幫助日後「反抗中國」的戰爭之框的形成，此點將於下文討論。

34 下文將會提到，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許多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過大東亞戰爭的台灣人被動員起來參與對抗國民政府軍隊的武裝作戰，進而形塑了新的「反抗外來政權」的戰爭之框。

35 另外值得參照的反例是，許多曾經在中國戰場直接參與殺戮的日本士兵，在戰後因為揚棄了「大東亞戰爭之框」，願意坦承過去的錯誤甚至道歉，反而能夠與中國人和解。曾經造成一時話題的東史郎即為一例。因此，若要論及記憶的「整合」或和解，重點不在於是否曾經在戰場上面對面直接交手廝殺，而在於採取什麼樣的識框來理解戰爭。

36 事實上，即使是獨派陣營內部，對於訴諸日本殖民遺緒來充當台灣民族主義內涵的做法頗有批評，認為台灣民族主義是從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發展出來的，應該與殖民者劃清界限，例如史明（2001：53）。

(2) 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之框：

這兩個戰爭之框，是由以「戰勝者」之姿接收台灣、又以「戰敗者」身分撤退遷台的國民黨政權所帶來。這兩個戰爭之框雖然一脈相承，日後合而為一，但就其起源、時間、含意與影響都有不同。1945年被帶入的是抗日戰爭之框，其目的在於扭轉台灣人的戰爭認識，確立中華民族的認同。1949年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反攻復國」的國共內戰之框才以台灣海峽為界被確立下來，而其主要的功能則是合理化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

和共產黨相較，國民黨版的中國民族主義同樣也凸顯百年來的民族苦難與恥辱，但其所採取的框架與強調的內容，則與共產黨迥異。尤其有關抗日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互相指控對方不抗日，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拯救民族危亡苦難的領導者³⁷。由於不同的戰爭之框將造成戰爭記憶的衝突，因此國民黨在接收台灣之後，便極力重建抗日戰爭之框，重新建立一套敘事框架，把台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種種作為都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包括將霧社事件納入「抗日戰爭之框」，甚至連從來沒有意識要為「中華民國」效命捐軀的莫那魯道也被入祀中華民

37 關於兩岸對抗戰的歷史書寫與紀念方式的差異，可參考張瑞德（1998）。事實上，兩岸對抗日戰爭的詮釋與歷史書寫，近年來也成了政治問題，每逢相關歷史紀念日時便被拿出來討論。共產黨過去一味強調自己在抗戰中「中流砥柱」的角色，對國民黨的角色不是刻意忽視就是扭曲抹殺。近年來，為了對台灣釋出善意，許多影視通俗作品已經較多地呈現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貢獻，而即使對解放戰爭的描述，國民黨的正面角色也比以往多了不少。不過，中共官方喉舌與政治領導人在正式場合言及抗戰時，仍舊只片面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國的忠烈祠，便是典型的「再框構」(reframing)的過程。

另一方面，國共內戰的框架，除了強調國民黨代表民族主義的正統之外，更大一部分在於合理化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在「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台灣社會被動員起來，透過戰爭來進行治理，成為國民黨在台灣長期維持威權統治的基礎；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勾踐復國故事，也成為國民黨官方意識型態所一再強調的宣傳教化內容(黃金麟 2009)。到了1950年代末，即使主客觀情勢已經顯示出「反攻無望」，但「動員戡亂」的戰時動員體制仍然牢牢地桎梏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除了包括戒嚴令在內的各種法令規章外，為了代表法統、維護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萬年國會，也可說是戰爭之框的產物。為了維持威權統治，國民黨政權在「動員戡亂」的名義下，一方面以戰爭威脅恐嚇人民，一方面則以「安定進步」、「和平繁榮」為訴求，限縮政治自由，壓制反對勢力。在此脈絡下，台獨與中共、黨外被塑造成「三合一」的敵人，都對台灣的和平與穩定造成威脅，內部敵人與外部敵人合而為一³⁸。

在此情況下，為了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戰爭之框與為了維持威權統治的國共內戰之框合而為一，成為冷戰時期台灣社會的基本框架。此一時期，除了學校中所推行的歷史教育、軍訓教育、保(密)防(諜)教育外，戰爭與軍事題材也成了大眾媒體與商業娛樂的重要元素。1970年代起，國民黨營的中央電影事業公司與軍方所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了大量以戰爭及軍事教育為題材的電影，包括《英烈千秋》、《八百壯士》、

38 參見本書第五章的分析。

《梅花》、《古寧頭大捷》、《黃埔軍魂》、《成功嶺上》等，除了商業放映外，也透過學校、機關、社教活動與電視頻道等大量反覆播映，成為台灣戰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³⁹。

我們可以說，國民黨自 1945 年以來在台灣的威權統治是建立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兩個戰爭之框上，而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其實也同時拆解了這兩個戰爭之框。若林正文（1989）以「脫內戰」來描繪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正是捕捉到了這個特質。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後，中華民國正式邁向「第二共和」，與國共內戰脫鉤⁴⁰。由於「共匪」不再被視為一個叛亂團體，國軍開始有了「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迷惑。過去官方所界定的「三合一」敵人不復存在，中共已經不再是假想敵，「黨外」成為合法政黨，而台獨不但成為合法的政治主張，受言論自由保護；尤有甚者，提倡「獨台」路線的李登輝與主張台獨的陳水扁，更先後贏得總統直選，成為三軍統帥。

儘管動員戡亂時期已經終止，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和對岸的

39 這些類型的電影大量製播的結果，是使得「軍教片」大行其道，成為台灣電影傳播史上的一個重要類型。在這股潮流下，不少民間電影業者也投入軍教片的製作，市場反應不差，例如 1987 年的《報告班長》，由於賣座甚佳，一連拍了多部續集。時至今日，儘管時空環境已經大不相同，軍教片仍是電影電視偏好的題材類型。這和台灣長期處於戰爭動員體制、各級學校學生都曾接受軍訓教育、且男性皆須服役的制度條件有關。軍教片容易引起廣泛的觀眾共鳴，喚起跨越世代的集體記憶。在此意義下，軍教片也可說是某種戰爭遺緒，和前一節提到中國大陸的「紅色經典」改編熱潮形成對照。

40 「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說法源自若林正文（1994），李登輝本人後來也採用類似的說法（林佳龍 2001：255）。

共產黨政府處於「交戰狀態」，但國共內戰的框架，仍是國民黨、統派以及對岸的共產黨定位兩岸關係的基本框架。換言之，儘管敵對關係暫不存在，但兩岸的關係仍被界定為因為內戰所造成的分裂。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灣基本上已經完成了「脫內戰」的過程，但國民黨在 2008 年後重新執政，在兩岸政策上試圖再次回到國共內戰的框架來詮釋兩岸關係，引發新的緊張、扭曲與矛盾。此點將於下一小節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框架，其實也是台灣社會內部分歧的主要區隔之一，例如所謂「本省」與「外省」的族群分類，背後也存在著戰爭之框所造成的區隔。尤其「外省人」因為戰亂而造成的流亡意識與離散經驗，是世代定居在台灣的「本省人」所缺少的。過去一種常見的說法認為，「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類屬，其實是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因為族群動員而被打造出來，畢竟「外省人」之間在語言、文化上的差異，不會比他們與本省人之間來得小。不過，這樣的看法，恐怕低估了戰爭之框與國族建構對框構現代中國國民（來到台灣後變成「外省人」）的影響。外省人所共同擁有的，是「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戰爭之框，他們有著共同的戰亂經驗，也有流亡主體所共有的恐懼（流離失所、無處可逃，有可能「被本省人丟到海裡」）⁴¹。相對地，普遍缺乏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經驗的本省人，即使不再抱持「大東亞戰爭」的識框，但因為雙方曾經深處敵對的陣營，彼此之間的猜忌與不信任，在戰後依舊持續，甚至進一步轉化成為新的「反抗外來政權」的戰爭

41 參見趙彥寧（本書第九章）。關於外省人的戰亂流亡經驗，另可參見李廣均編（2010）。

之框⁴²。

(3)「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

台灣存在的第三種戰爭之框，可以用「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來概括。和前兩種戰爭之框不同的是，這個戰爭之框是以台灣為預設的戰爭主體，不存在另一個殖民母國或祖國。如前所述，民族主義的背後多有一個或多個戰爭之框，台灣民族主義也不例外。從台灣民主國開始，台灣早期的武裝抗日行動雖然缺乏清楚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而且不乏「前現代」的特質⁴³，但一個「我族 vs. 他者」、對抗外來統治者的戰爭之框，已然存在台灣社會。到了1945年以後，由於對「祖國」的失望，「外來統治者」的指涉對象從日本殖民政府轉為國民黨所代表的外省人／中國政權，二二八事件所引發的激烈對立衝突，對某些參與者與詮釋者來說，其實已經不啻一場戰爭⁴⁴。這個「反抗外來政權」的戰爭之框，將國民黨視為來自台

42 精確一點地說，本省人在1945-1949年間也曾被短暫動員參與國共內戰，其中一部分人或因被俘，或因轉投共軍等因素而留在大陸。這些被稱為「台籍老兵」的人，和「台籍日本兵」類似，被原有的效忠對象摒棄、在現有體制中又因曾為「框外的敵人」而得不到肯認，是一群處於夾縫中的「零餘主體」。參見許昭榮（1995）。

43 例如姚人多（本書第五章）所引述林少貓與日本殖民政府交涉的文字，明顯可看出「前現代」的林少貓完全不識現代民族國家為何物。

44 值得注意的是，戰爭在此處並不僅僅是個比喻，而是實質存在。從現有的研究與資料可以發現，當時全台各地都有組織武裝部隊的紀錄，曾經參與大東亞戰爭的台籍日本兵也在動員之列，參與對抗國民政府軍隊的作戰。參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1994）。有關暴動、叛亂、起義、內戰等不同概念與戰爭間的模糊關係，參見朱元鴻

灣外部的殖民統治者，否定中華民國的合法性，是所謂「台獨基本教義派」所一貫堅持的識框⁴⁵。這個識框，基本上是針對台灣過去因戰爭造成統治者更迭所導致的苦難傷痛，逐漸醞釀而產生。

到了1990年代，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執政黨從人民主權、而非歷史法統取得了執政合法性，中華民國也因為「第二共和」而獲得正當性，一種新的「反侵略、反併吞」的戰爭之框開始浮現。這個新的戰爭之框，伴隨中共不斷的軍事演習與武力威脅而逐漸醞釀生成，在1996年的台海危機臻於完備。「中共武力犯台」不再只是國民黨拿來恫嚇人民、打擊「三合一敵人」的藉口，而是活生生的經驗事實，進一步激發台灣內部「同仇敵愾」的共同體想像⁴⁶。這個戰爭之框，延續著國民黨過去反共、仇共、恐共的框架，但已經被「轉調」（re-keying）或重新定調。此時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已經無法再用「國共內戰」的延續來理解，而是被視為「侵略」、「併吞」；兩岸間的對抗，被理解為作為新興的想像共同體（無論其名稱為「中華民國」或「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戰爭。

就當前的台灣民族主義而言，無論是否認同「中華民國在

（本書第二章）。

45 例如主張武裝鬥爭路線的史明，把台獨運動定位為「反殖民地革命」，反對民進黨的體制內改革，認為必須推翻中華民國體制，台灣獨立革命才算達成。

46 值得一提的插曲是，1990年代的台灣曾經出現過一本描述解放軍攻台的預言小說《一九九五·閏八月》（鄭浪平1994），雖然事後證明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但從當時這本書的熱賣與台灣社會的議論反應來看，當時正值民主轉型的台灣，的確深深被戰爭陰影所籠罩。

台灣」，無論是認為「建國尚未成功」或認為「台灣已經獨立」，都共享這個對抗中國的戰爭之框。例如黃昭堂就曾說：「面對中國的對台侵略，台灣人應有『來，就戰罷！』這個決心，否則不要奢望獨立，也不要以為維持現狀就能保持平安。……不惜一戰的決心，是台灣最需要、最基本的國防能力。」（黃昭堂 1998：178；黑體為筆者所加）。史明（2001）的武裝鬥爭路線原來針對的是國民黨政權，但後來也針對中國。從 1992 年至 2008 年，無論是國民黨的李登輝或民進黨的陳水扁主政，這個戰爭之框都是受到國家機器的支持的。弔詭的是，獨派陣營一方面要擺脫國共內戰的遺緒（因此台灣問題不應被視為中國國內事務、也不是國、共兩黨可以私相授受予以解決），一方面則又承襲了國民黨的「反共」遺緒，將「反共」轉調成「反中」，建構出新的對抗中國的戰爭之框。

上述的戰爭之框，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的時代，儘管執政黨不同，但都得到國家機器的背書支持。2008 年，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之後，大陸政策改弦更張，對中國不再採取對抗的策略，不但招致獨派陣營「親中賣台」的批評，也引發了「敵我不分」的疑慮。由於獨派陣營把中國當成框外的敵人，因此舉凡與中國相關的事務，包括資本、企業、觀光客、留學生等，都傾向於採取敵視或防禦的態度。「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其實繼承了「大東亞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框架，把台灣與中國對立起來，僅是將前兩個戰爭之框加以轉調。2013 年，馬英九出席世界自由日大會活動，發表了一席關於兩岸和平的談話，卻引來獨派陣營的強力反駁與抨擊。我們可以從《自由時報》的社論來理解這個轉調的變化：

馬英九為了強調和平的重要性，又指「兩岸有相當長時間處於內戰狀態，死亡人數可說破百萬人」，這就更讓人不解馬在不知所云什麼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打內戰，死了超過百萬人是有，但「兩岸」之間何時打過內戰？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八年，發生的是國與國之間的中日戰爭，台灣當時是日本殖民地；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國共爆發內戰時，戰場在中國，因此，馬英九的「兩岸內戰說」可以休矣！兩岸之間若爆發任何軍事衝突，就是侵略，毫無模糊地帶，更不容主政者懷抱大中國情結危及台灣的安全。

（《自由時報》2013/1/24 社論）

這段文字可幫助我們理解獨派陣營如何承襲過去既有的戰爭之框並加以轉調。第一，1945 年以前，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中國其實是屬於敵對狀態，而且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不是內戰。第二，國共內戰在時間和空間上，僅限於 1949 年以前的中國大陸，與台灣無涉。第三，兩岸之間的軍事敵對關係不是「內戰」，而是「侵略」，且「毫無模糊地帶」。很顯然地，這段文字極力想要撇清台灣與國共內戰的關係，另外重新樹立一個「反侵略」的戰爭之框，而 1949 年以後台海曾經發生過的諸多戰役，在這套框架下，也從國共內戰被轉調為「反侵略」的戰爭了。

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在當前的台灣存在著多重的戰爭之框，這些戰爭之框彼此之間存在矛盾，卻又相互生成轉化，以致造成許多矛盾或弔詭的現象。1990 年代國軍「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迷惑，到了馬英九時代恐怕更加凸

顯。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無論主張「獨台」或「台獨」，至少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戰爭之框是很明確的。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反攻復國」既然不再是一個受到官方支持的戰爭之框，那麼國共將領「一家親」的畫面，便在 2008 年以後頻繁出現，而國軍高階將領成為「共諜」，也時有所聞⁴⁷。但另一方面，儘管「動員戡亂時期」早已結束，國民黨仍用「國共內戰」的格局來理解兩岸關係，使得台灣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脫內戰」效果打了折扣，似乎又走回了內戰的格局。此外，獨派陣營與中國政府看似處於對立狀態，但兩者所懷抱的戰爭之框卻是錯位的。中國想用國共戰爭的遺緒來框住台灣，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獨派陣營則是要掙脫國共內戰的框架，以國與國之間的主權戰爭來定位兩岸對立的態勢。這些交錯在台灣內部與外部的戰爭之框，也造成了統獨問題的複雜難解⁴⁸。

47 嚴格來說，國共雙方互相滲透、吸收對方成員作為己方間諜，並非新的現象，早自「剿匪」、「長征」時期即有。由於缺乏明確的資料與統計數據，我們很難判定現階段的國軍「變節」而為對方吸收比過去更多或層級更高，但可以確定的是，由於國家定位與「敵人」不明確，國軍在民主化之後面臨轉型而產生士氣低落的情形，這在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尤其明顯，不少將領對於作為三軍最高統帥的總統並不認同。

48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馬英九在 2013 年國慶文告中宣稱兩岸關係並非國際關係，引起綠營不滿。隨後國防部長在立法院回答民進黨籍立委質詢時，被迫說出兩岸關係是「敵對關係」。換言之，對於尋求台灣獨立的人來說，兩岸之間的戰爭之框是不可以被模糊抹滅的。

四、結語：重審現代性——戰爭、國家與「合法暴力」

為了將戰爭問題化，本文提出「戰爭之框」作為分析戰爭與戰爭遺緒的概念，並探討了日本、中國與台灣的戰爭之框。戰爭與戰爭遺緒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除了表現在政治體制、統治技藝、生產消費、社會制度、身體規訓以外，還有一部分在於戰爭所創造出的識框。和 Goffman 的框架分析相同，本文的分析也可說是一種「現象學的還原」⁴⁹，試圖探討與揭露戰爭在這個看似和平的時代所曾經發生的作用與留下的遺緒及其影響。戰爭裡有太多生離死別的感人故事，有人性的扭曲，有命運的捉弄擺布，有捨己為群、犧牲奉獻、捨生取義的高尚情操，另外還有慘絕人寰的凌虐殺戮，以及多不勝數、無情殘酷的悲慘遭遇。如果不去探究戰爭之框及其背後的作用與意涵，我們很容易深陷在記憶的泥淖裡，在紛亂複雜的細節中迷失，甚至流於表面浮淺的描述、感慨與喟嘆。面對形形色色的戰爭之框保持清醒與警覺，是我們處理戰爭與戰爭遺緒時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態度。

49 在傳統的社會學理論教科書中，Goffman 常被標示為「戲劇論」(dramaturgy) 或「互動論」，比較少被當成現象學。但事實上，從理論系譜來說，他直接受到 Alfred Schutz (1967) 與 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的影響(本文援引的《框架分析》尤然)，可說是介於現象學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之間的一種取向。此外，他的分析主要是把現象學當成一種方法論的基礎，但對於現象學理論所注重的人類意識與經驗，他則較少著墨。參見 Lanigan (1988), Smith (2005)。

戰爭之框也幫助我們理解，人與人之間為何無法和解，甚至要相互殘殺。不去追究戰爭之框的形成，無法從根化解紛爭、達致和解。戰爭與國家暴力所造成的苦難與傷痛，其實是類似的，不同群體間的苦難經驗，也有很多可以相通之處。然而，戰爭之框卻隔離了不同的群體，阻斷了彼此的感知與體驗交流。框內與框外難以相互理解，兩個敵對的戰爭之框尤其如此，彼此不可共量。現代性強調人的平等與尊嚴，戰爭之框卻讓人的生命不再平等、也失去尊嚴。有些人的生命比起另外一些人更有價值，有些生命的失去是「可悲傷的」，而另外一些生命的失去則是「不可悲傷的」。用克勞塞維茲的話來說，戰爭以屈服敵人的意志為目的，因此戰爭之框的存在，不僅妨礙了彼此的理解，也阻斷了溝通與對話的可能。

本文並不是要強調戰爭之框的牢不可破與無所不在；恰恰相反，戰爭之框能夠藉由不斷地反思而被超越。近年來的許多研究與事例也顯示，許多戰爭的記憶與敘事是逸出標準的戰爭之框的。然而，我們也不應忘記，戰爭之框依舊牢固也深遠地影響著許多人對這個世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看法，正如同儘管「全球化」的說法人人琅琅上口，許多人相信「後民族」或「超國族」的時代已經到來，但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制度仍舊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運作，構成了「日常的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 Billig 1995)。同樣地，戰爭之框的作用，讓人們不自覺地活在「戰爭狀態」中。戰爭之框提醒我們，在這個看似和平的年代，戰爭其實離我們不遠；戰爭的遺緒，透過戰爭之框，繼續影響著人們看待世界、界定問題的方式。戰爭之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詮釋民族的過去與未來，但也加

諸許多限制，使得不同框架的人們難以相互溝通理解⁵⁰。當前東亞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僅僅是喊出「和平」、「和解」、「共生」的口號，恐怕效果有限；最重要的是，身處其中的人們有必要在不同識框之間轉換，進而超越這些戰爭之框。

另一方面，本文的分析也試圖指出，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現代性在中國與日本的開展，以及台灣國族問題的起源，都直接與戰爭(或戰爭威脅)與戰爭遺緒有關。原本封閉自足的德川幕府與滿清朝廷對於西方外來文化與政經體制原來一直抱持抗拒的態度，但西方的堅船利炮迫使兩國不得不打開大門，開啟現代國家建設之路。這兩個國家的國族建構過程都涉及一連串的戰爭，也都出現過十分明確而影響深遠的戰爭之框。在日本，這個戰爭之框從日清、日俄戰爭發足，經過滿洲事變與支那事變，至大東亞戰爭而達於全盛。這個戰爭之框在1945年8月之後隨著日本敗戰而被拆解。美國在占領期間嘗試以自己的戰爭之框(太平洋戰爭)來取代舊有的戰爭之框(大東亞戰爭)，但又同時以指導者的姿態建立了「和平憲法」，一方面要讓日本這個國家放棄部分「合法武力」的行使，一方面則以「美日安保條約」將日本納入自己的戰爭之框。這一切的扭曲，造成戰後日本許多紛爭擾攘的根源，而新民族主義者也以「歷史修正主義」的方式，嘗試回覆戰前的戰爭之框。而在中國，歷經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乃至抗美援朝戰爭，中

⁵⁰ 這種溝通理解的障礙，不僅出現在政治場域，也出現在文化場域。例如近年引發話題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在中國大陸上映時反應不如預期，甚至招致批評，因為觀眾們透過習以為常的戰爭之框，在電影裡看不到抗日戰爭所應該有的「民族大義」。

共政權成功地確立了一個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戰爭之框。這個戰爭之框合法化暴力與武力的使用，充滿了對烈士英雄的謳歌讚美，以及對軍事戰爭的稱頌肯定。這個戰爭之框提供了當代中國的國族定位，維持政權合法性，不但為官方一再複製重述，成為國族敘事的基本框架，更是許多民族主義者理解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世界局勢的參考架構。

由於這樣的差異，我們在兩國的戰爭記憶中觀察到一種不對稱的光景：一方面是對戰爭記憶／紀念的否定、壓抑、抹消、反覆質疑與不斷淨化，另一方則是對戰爭英雄、革命烈士與建國神話的大肆紀念與謳歌頌揚。這個不對稱，並不能簡單地以「侵略戰爭」與「自衛戰爭」的對比來作結；彰顯這個對比，也不是要暗示哪一邊比較「好戰」、哪一邊比較「和平」。這個比較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價值評判的目的，而是希望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反省戰爭作為一種集體暴力如何在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被正當化的問題。何以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都是從戰爭與戰爭威脅開端？為什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都必然經過、走向戰爭之路？戰爭與現代性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聯？

關於戰爭與現代性的關聯，近年來已開始受到學界關注（Lawrance 1997, Joas 2003）。這些研究都指出一個明顯的悖論：現代性所立基的啟蒙理性，其實對人類世界的和平前景抱著樂觀的態度，人們相信隨著理性文明、工業科技與自由市場貿易的到來，人類社會將從蒙昧走向開化，從野蠻邁入文明，被視為野蠻與非理性的暴力與戰爭將會逐漸減少，甚至消失。然而，歷史卻向我們證明，啟蒙以來的現代性在全球的開展，只帶來了更多的暴力與戰爭，19世紀以來全世界因為戰爭與集

體暴力而死亡的人數，甚至遠超過先前人類歷史的總和。為什麼人們相信理性與和平，而其結果卻是暴力與戰爭？這不只是個道德與倫理的課題，也是個社會學的課題：為什麼在人的生命價值被奉為無比神聖崇高的現代，組織化暴力卻如此橫行，造成史上空前的殘酷殺戮與巨大傷亡？為什麼以解放為名的各種運動（無論解放的對象是工人、農民或是弱小民族），卻帶來了更多的壓迫與苦難？

現代性並不是一個扁平單一的結構，而必須同時從不同的面向來加以掌握。現代性可以從幾個制度叢結（institutional clusters）來理解，包括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工業化、現代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等（Giddens 1990）。這些制度叢結，創造了人與人、群體與群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巨大不平等，包括財富、權力與軍事實力。資本主義或工業化本身並不必然隱含暴力，與戰爭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聯；然而，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所構成的國際體系，以及背後所牽涉的地緣政治中，重視戰爭與尚武精神的軍事主義（militarism）卻是國家生存極為重要的關鍵（Mann 1988: 124-145）。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以及工業化所帶來的科技進步，使得部分國家得以藉由擴張軍備與改良武器而獲得了更強的軍事實力。一旦軍事實力的不平等結合上累積財富與擴張權力的欲望，現代性便帶來了規模越來越大、殺傷力越來越強的戰爭，而其結果，是帶來更多的壓迫與更深的的不平等。東亞的現代性，正是在這個反抗不平等的過程中展開的。的確，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來看，中國與日本並不特殊。和許多歐美國家比起來，他們並沒有特別「好戰」，也沒有從事更多的戰爭。他們甚至可以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宣稱，自己之所以「被迫」走向戰爭之路，透過軍事武力來建立自己

的國家，也正是因為受到西方列強的暴力侵侮。我們所面臨的課題，是必須重審現代性，檢視現代性與暴力、戰爭的關聯。如同本書導論所指出的，暴力如何取得合法性、戰爭與政治如何關聯，是理解現代性的一個重大關鍵。如果在東亞有一個共同的現代性，那麼戰爭與戰爭遺緒，將是構成其核心的重要元素；如果要從東亞共同的歷史經驗裡尋找一個可行的「現代性批判」方案，那麼對於戰爭與戰爭遺緒的反省，也許將是獲取金鑰的線索。這也是未來的研究中值得繼續探索的課題。

參考書目

一、中文及日文書目

- 《自由時報》，2013/1/24，〈社論〉。
- 子安宣邦，2004，《国家と祭祀：国家神道の現在》。東京都：青土社。
- 小林よしのり（小林善紀），1998，《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戦争論》。東京都：幻冬舎。
- 小森陽一，1998，〈文学としての歴史／歴史としての文学〉，收於小森陽一、高橋哲哉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頁3-17。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
- 小熊英二，2002，《〈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都：新曜社。
- 山室信一，2007，《憲法9条の思想水脈》。東京都：朝日新聞

- 社。
- 木坂順一郎，1993，〈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呼称と性格〉。《龍谷法学》25(4):28-76。
- 毛澤東，1965，《毛澤東選集》（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牛村圭，2005，《「文明の裁き」をこえて：対日戦犯裁判読解の試み》。東京都：中央公論新社。
- 加藤典洋，1997，《敗戦後論》。東京都：講談社。
- 史明，2001，《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立革命》。台北：前衛。
- 司馬遼太郎，1978，《坂の上の雲》。東京都：文藝春秋。
- 白永瑞，2009，《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唐山發行。
- 石坂浩一等，2005，《東アジア・交錯する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都：社会評論社。
- 成田龍一，1998，〈司馬遼太郎の歴史の語り〉，收於小森陽一、高橋哲哉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頁69-84。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
- 曲波，1959，《林海雪原》。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竹內好，2005，《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 西尾幹二，1999，《国民の歴史》。東京都：扶桑社。
- 吳強，1961，《紅日》。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宋強、張藏藏、喬邊，1996，《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 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2009，《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李廣均（編），2010，《離與苦：戰爭的延續》。台北：群學。
- 杜鵬程，1956，《保衛延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汪宏倫，2001，〈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1:183-239。
- 汪宏倫，2006，〈怨恨的共同體，台灣〉。《思想》1:17-47。
- 汪宏倫，2010，〈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19:147-202。
- 汪宏倫，2013，〈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多重變貌：形式結構與質料內涵的解析〉，發表於「台灣：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論」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10-25。
- 周立波，1958，《山鄉巨變》。北京：作家出版社。
- 周婉窈（編），1997，《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周婉窈，2003，《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 林佳龍，2001，〈台灣民主化與國家形成〉，收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217-266。台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 林房雄，1964，《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東京都：番町書房。
- 河上徹太郎、竹內好，1979，《近代の超克》。東京都：富山房。

- 柳青，1960，《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若林正丈（著），何義麟、陳添力（譯），1989，《轉型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台灣》。台北：故鄉。
- 若林正丈，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
- 倉沢愛子、杉原達、成田龍一、テッサ・モーリス・スズキ、油井大三郎、吉田裕（編），2005，《なぜ、いま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か》。東京都：岩波書店。
- 高坂正顯、西谷啟治、高山岩男、鈴木成高，1943，《世界史の立場と日本》。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 高橋哲哉，2007，《靖國問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高橋哲哉，2008，《國家與犧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瑞德，1998，〈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收於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075-1138。台北：國史館。
- 梁斌，2005，《紅旗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許昭榮，1995，《台籍老兵的血淚恨》。台北：前衛。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 1895-2005》。台北：聯經。
- 黃昭堂，1998，《台灣那想那利斯文》。台北：前衛。
- 黃智慧，2011，〈解讀高砂義勇隊的「大和魂」：兼論台灣後殖民情境的複雜性〉。《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1(4):139-174。
- 楊沫，1959，《青春之歌》。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 店。
- 福澤諭吉，2003，《時事小言·通俗外交論》。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 蔡慧玉（編），1997，《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鄭春河，1995，《台湾に生きる大和魂》。出版地不詳。
- 鄭浪平，1994，《一九九五·閏八月：中共武力犯台白皮書》。台北：商周。
- 羅廣斌、楊益言，2000，《紅岩》。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藤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1996，《教科書が教えない歴史》。東京都：産経新聞ニュースサービス。
- 鶴見俊輔，1982，《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一九三一～一九四五》。東京都：岩波書店。

二、英文書目

- Alexander, Jeffrey C. and Rui Gao. 2007.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Cultural Trauma,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Chinese Identity." pp. 266-294 in 孫康宜、孟華編，《比較視野中的傳統與現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Anderson, Benedict. 1998. "The Goodness of Nations." pp. 360-368 i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 Arendt, Hannah. 1963. *On Revolution*. New York; London: Viking Press; Penguin.
- Benford, Robert D., and Davi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1-39.
- Berger, Peter L., and Thomas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 Butler, Judith. 2009.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New York: Verso.
- Callahan, William A. 2004. "National Insecurities: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lternatives* 29:199-218.
- Callahan, William A. 2006.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8(2):189-208.
- Denton, Kirk, A. 2007. "Horror and Atorcity: Memory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Chinese Museums." pp. 245-286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dited by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wer, John W. 1999.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ara, Prasenjit.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 Foucault, Michel. 2003.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New York: Picador.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garashi, Yoshikuni. 2000. *Bodies of Memory: Narratives of War in Postwar Japanese Culture, 1945-19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as, Hans. 2003. *War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estnbaum, Meyer. 2005. "Mars Revealed: The Entry of Ordinary People into War among States." pp. 249-285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homas S. 1969.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anigan, Richard L. 1988. "Is Erving Goffman a Phenomenologist?"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5(4):335-345.
- Lawrence, Philip K. 1997. *Modernity and War: The Creed of Absolute Viol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ann, Michael. 1988.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Miner, Richard H. 1971. *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tter, Rana. 2003. "Old Ghosts, New Memories: China's Changing War History in the Era of Post-Mao Poli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1):117-131.
- Mosse, George L. 1990. *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iver, Pamela E., and Hank Johnston. 2000. "What A Good Idea! Ideology and Frame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Mobilization* 5(1):37-54.
- Orr, James J. 2001. *The Victim as Hero: Ideologies of Pe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Renan, Ernest. 1990[1882]. "What is a Nation?" pp. 8-22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ited by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 Rose, Nikolas. 1999.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 Private Self*.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Said, Edward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Saito, Hiro. 2006. "Reiterated Commemoration: Hiroshima as National Trauma." *Sociological Theory* 24 (4):354-376.
- Schutz, Alfred.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eraphim, Franziska. 2006. *War Memor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Japan, 1945-2005*.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Sewell, William Jr. 2005.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ith, Gregory W.H. 2005. "Enacted Others: Specifying Goffman's Phenomenological Omissions and Sociological Accomplishments." *Human Studies* 28(4):397-415.
- Snow, David A. 2004. "Framing Processes, Ideology, and Discursive Fields." pp. 380-412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2000. "Mobilization Forum: Comment on Oliver and Johnston." *Mobilization* 5(1):55-60.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64-81.

-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Wang, Horng-luen. 2012. "War and Revolution as National Heritage: 'Red Tourism' in China." pp. 218-233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Heritage in Asia*, edited by Patrick Daly and Tim Wint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Wang, Horng-luen. Forthcoming. "Comparison for Compassion: Exploring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East Asia." in *Comparatizing Taiwan*, edited by Ping-hui Liao and Shu-mei Shih.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Winter, Jay. 1995.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neyama, Lisa. 1999. *Hiroshima Traces: Time, Space, and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arrow, Peter. 2005.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聯經評論

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

2014年7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9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汪宏倫等
編者 汪宏倫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 0100559-3 號
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 吳淑芳
整體設計 劉克韋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416-0 (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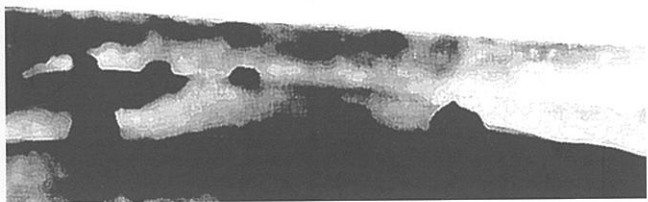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4 | 時報
出版
1974
2014

汪宏倫 主編

社 會 戰 爭 與



理論、歷史、主體經驗